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6年2月29日第65期

## 本期目录

### 生逢乱世

蒋寄梦 钱塘纪事——上海戏剧学院“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运动散忆

王 锐 我所经历的“二月镇反”和“三月黑风”

### 争鸣

艾 群 关于《乱世狂女》和“奉陪到底”等问题的说明

### 风云人物

李海文 张春桥“家书”之外的另一面

### 书海泛舟

乔晞华 《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南外红卫兵打死工人王金事件个案分析》简介

乔晞华 南京王金事件始末（《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南外红卫兵打死工人王金事件个案分析》选读）

### 民间记忆

徐小青 留存痛史的塔园——记中国首座民间文革博物馆

何 蜀 提供并录入、注释 阎肃有关京剧《红岩》的一封信

---

### 【生逢乱世】

## 钱塘纪事

——上海戏剧学院“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运动散忆

蒋寄梦

兵营中的异类群体

1968年9月，我们上海戏剧学院67届全体学生，为“接受解放军再教育”，开到钱塘江畔一个军垦农场扎下了营盘。

钱塘水居江海之会，地形比较复杂，五代时吴越国的君主钱鏐为保护城池免受巨浪冲击，筑起了一道长长的石堤。富春江夹带上游的泥沙蜿蜒东下，却被汹涌的海潮一次次推回去，一千年过去了，石堤外淤积成一片广袤的滩涂，叫“下沙”。我们的学业就是在部队官兵的带领下，将这片滩涂改造成良田。

我们这批人来自上海的许多高校，按正规军的编制，隶属于浙江省军区，总场为师，分场为团，下边的营、连、排各级首长均为现役军人，而且是四个口袋的干部。班长属于战士，所以由学生担任。

上戏67届学生中包括表演系三年级，导演系四年级，舞台美术系三年级、四年级，共四个班级一百余名学生。我所在的舞美系四年级造反派最多，其中有好几位是院级头儿。当初我们冒着风险造院党委的反，历经半年的艰辛曲折，终于取得胜利。半年的冒险有了丰厚的回报，革命委员会建立，小将一个个被封为主任、副主任、常委、委员，全面掌控学院的党政财文。遗憾的是小将的执政宏图还没来得及充分展开，却统统被赶鸭似地送往农场“接受再教育”。头儿们一下农场，就等于被自行解除了职务，没有任何正式的任免程序，刚到手的封赏一夜之间全没了。小将这才发觉，所谓的新生红色政权，原来是一块纸糊的招牌。

可是小将一时间还不能适应这种身份的转换。人虽下了，心还在岗上，造反派核心没有散，头儿的凝聚力还在，于是造反派一进入军垦农场就成了一个异数。一伙人无事总爱往头儿身边靠，就像圣爱伦岛上那个退位的拿破仑和他的将军们，这个古怪的集体也就成了兵营中的一块化外之地。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样的状况是部队里绝对不能容许的，于是教育反教育、改造反改造的斗争尖锐曲折地在钱塘江这一片滩涂上展开。

### 恶搞“三忠于”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下沙所受到的不仅仅是生产斗争的教育，因为从经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成果并不理想，我们几乎天天都在建造一种叫沟渠的东西，由于土壤的含沙量很高，土质十分松软，挖了又坍，坍了再挖，将近两年的劳作，沟渠总算进了水，秧苗也插了下去，却没看到有什么收成。我们拿的是大学毕业生工资，浙江为六类地区，则每人每月四十五块半，略高于普通市民的收入。几十所大学几千号人屯兵于此，打的是人海战术，要是进行市场运作的话，一块钱恐怕只能买到几粒米，农场定要宣告破产。所以“不算经济账，只算政治账”，而从政治这个角度计算，我们的收获便不那么简单了。

那时候全国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三忠于”活动，所谓“三忠于”，即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说白了三合一，就是忠于毛主席他老人家。全体学生兵每天清晨军号一响就立刻起床，一个个神速列队于老人家宝像前。首先举起红宝书山呼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接着打开了不干不净的嗓子唱《东方红》。唱完《东方红》就拉出去跑步。跑过了步洗脸刷牙。洗漱完毕集合于食堂宝像前再次举起红宝书山呼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于是进行早餐。早餐后以班为单位天天读毛选一小时。之后就扛起农具出工。此后午餐晚餐前都要到食堂山呼万寿无疆永远健康。而晚餐后还有一项仪式，那就是晚汇报，晚汇报通常在忠字台前举行。

忠字台建在各连部的活动室，其款式大致相同，首先把宝像“请”到墙上，宝像左右贴有一副对联——如果上联为“四海翻腾云水怒”，下联则“五洲震荡风雷激”。宝像以下安有三颗红“心”，每颗心中皆剪空一个忠字，这样便把主题给点上了。墙下还有一方案桌，铺上了红布，中间的位置整齐地安放雄文四卷，周围供上了军垦战士精心制作的工艺品，大都为毛竹笔筒，筒身上镌刻有老人家的语录。忠字台是全连政治的制高点，它美轮美奂光照四壁，一走近它，同学们会不由自主放轻了脚步，变得庄重，变得虔诚，当着老人家的面把灵魂深处的活思想包括一闪念都如实地说出来。一般流行的说法是，这世上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人人都有私，有私就得斗，藏私纳私同私睡过夜都是不忠的表现，所以这个程序每天都得过。

三忠于活动的表达方式越来越丰富多彩，还有忠字歌、忠字舞、忠字操、忠字拳等等，连轴转似地行礼如仪，成为人们每天最重要的政治活动。

然而事物总要一分为二，再动听的歌也架不住天天唱，这么反来复去的山呼汇报，时间一长也让人觉得身心疲劳。更为严重的是我对于三忠于活动产生了不该有的联想，忍不住说了一些难听的话，比如把忠字台比作佛教的神龛，把山呼仪式比作饭前的祷告，把斗私批修比作天主教那种忏悔。当然我只是说说罢了，图嘴上一时之痛快，而我们一个头儿却做出了恶劣的行动。

据说外面一些地方还建起了忠字塔，可是我们农场还没有建，大家只闻其名未见其形，想象不出那是怎样的模样。忽一日，有消息传来说，我们这个头儿造起了忠字塔，大家一听便纷纷赶过去看。那是江堤下一块正在开垦的处女地，他们这个班正在开挖一道沟渠，别人将铲起的土方整齐地垒在沟沿两侧，头儿却另外选了一个地方，将土堆成了一座小山，这就是他宣称的“忠字塔”。忠字塔即将封顶，他正铲着最后的几方土，时当盛夏，他脚拖塑料凉鞋，只穿了条平脚裤，露出一身瘦瘦的黑肉，他每将一铲土堆上，还跟着唱一句：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此人不善歌咏，好歌也要

被他唱歪，大家正看着发笑，我偶一回头发觉指导员也站在我们身后，他那脸色刷一下全黑了。

## “摇羽毛扇”的我

指导员姓鲍，阶级觉悟高，警惕性也强，我们下农场前，鲍指导员已经看过我们的档案。自从发现这一系列“阶级斗争新动向”以后，再把我们这些人像筛网似地细细过一遍，于是就有了重大发现。造反派大都为工农子弟，还有的来自于干部、军人家庭，如恶搞“忠字塔”的那个头儿就来自于革命干部家庭。应该说造反派大多数本质是好的，他们之所以会变，一定是受了别人的影响。于是他把注意力转向我，认为根子在我身上。（下图：作者当年在钱塘江畔军垦农场。）



我父亲是国民党的一名军官，大陆解放前去台湾，后来又奉派回来进行“反共复国”活动，被人民政府逮捕后镇压。有一首民歌大家都知道：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藤结什么瓜。在鲍指导员看来，像我这种人，别指望会真心爱党爱伟大领袖。我之所以混迹于造反派队伍，一定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加上我平时话语不多，与他们军人总保持着一定距离，就更显得云山雾嶂。鲍指导员几次在全连会上提到我连有一个摇羽毛扇的人，这个人指的就是我。

说起摇羽毛扇，我眼前不禁会浮现羽扇纶巾、充满智慧的诸葛亮。我觉得鲍指导员实在是高抬了我，这把扇子我是摇不动的，以我的能力还做不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不是军师，只是头儿帐下的一名战士，或者说是一员战将。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认为对待自己应当客观。于是我常常表现得很谦虚，把我的缺点坦诚地告诉别人，希望他们不要对我评价过高。但效果并不理想，有人表现沉默，有人一笑而去。

我再一琢磨，才发现我其实没听懂鲍指导员的意思，他并不是肯定我有能力，他是要大家提防我。我们这个连来自五六所院校的学生，互相并不了解，经鲍指导员这么反复提醒，大家看我的眼神就不一样了，我仿佛成了传统戏三花脸扮演的那种绍兴师爷，专门撺掇别人朝前冲，自己则躲在背后偷着乐。这么歹毒，这么下作。

鲍指导员把我弄得很苦恼，我迫切要求改变自己的公众形象，渴望着大家能了解我。皇天不负有心人，这个机会终于被我等来了。

1970年新年刚过就下了一场大雪，厚厚一层覆盖在原野上。瑞雪兆丰年，农民们盼着今年有个好收成，中央这年也撒开了一张大网，要来个“鱼呀鱼满舱”。

那是一个阴冷的早晨，在凛冽的寒风里我们被集中到了场部广场听文件。文件有三，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简称“一打三反”。然而运动开展起来过后自始至终强调的只是“一打”而没有“三反”。

作为运动的序幕，场部领导特地安排了一档节目：把邱励欧女生押上台批斗。邱励欧是复旦原“孙悟空”成员，当年金猴大闹上海滩威名扬四方，而今该组织已定性为反革命小集团。

我与邱励欧并不陌生。文革造反之初，“孙悟空”就是我们的战友，1966年8月17日，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邱励欧、安文江、谭启泰、周谷声等复旦造反派，在“猴王”胡守钧率领下，冲开上戏大门来支援我们，酿成了震动全市的“八一七”事件。邱励欧为物理系67届，也在我们农场，她所在的连离我们不远，因为爱好美术，所以常常来我们这里看画。

这里我还要补充说明的是，上海大专院校67届学生都是分配之后下农场锻炼的。唯有两所艺术学院，即戏剧学院与音乐学院没有分配。据说这是江青的决定，是为今后开排样板戏储备人才。据说江青还指示学生们继续专业训练，所以音乐学院将乐器都带到了农场，每天晨练鼓号齐鸣。还有两架钢琴抬到了会场兼饭厅的工棚里。钢琴系的赵晓生，是造反派组织“小人物”的头儿，我们去支持过他们，关系一直很好。赵晓生负责管理蔬菜田，常常在施肥之后，将粪桶一搁，在水渠里洗一洗手就上了钢琴。我与几位爱乐者时去聆听，除了弹《红灯记》，他还弹肖邦、柴可夫斯基，甚至拉赫玛尼诺夫。样板戏需要嘛，江青同意的，我们就有恃无恐。我懂一点钢琴谱，有时还伸手帮他翻谱。

至于我们上戏舞美系，常常收工号一响，就争先恐后背起画箱上大堤钻树林，为的是抢黄昏景色。我班造反派聚集着多名绘画高手，到晚饭时分，就像开了个画展，大家都会捧着饭碗过来欣赏。每当这时，邱励欧就成了我们的座上客。邱励欧看画时只是微笑，很少说话，这位著名造反女将实际上是个端庄女。

还在“一打三反”运动之前，就听说“孙悟空”出了事，邱励欧也被抓去上海关押。今天农场特地把她从上海“借”来示众，是为了“杀猴儆猴”，给全体一个震慑。

批斗会进行时，邱励欧身穿一件大衣，微低着头站一张凳子上，看上去依然神态安详。可台下的气氛却很紧张，军人站在四周，将目光一遍遍地朝我们脸上扫，同学们一个个噤若寒蝉，连大气都不敢出。这场运动显然是冲着我们来的，其目标所向就是造反派。

可这也怪不了谁，文革一开始中央就将其战略部署告诉过我们。那时候中央的“十六条”里明确规定：“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这对于我们无疑是一种鼓舞，因为造反派是少数，属于珍稀，值得保护。可广大群众不这么理解，他们认为我们是一种难得的教材，保存我们是为了在阶级教育中发挥作用。所以尽管我们处境困难，倒没人来主动为难我们，我们的行动不受限制，无论吃饭睡觉包括外出均享受同志待遇。不过“十六条”里还有一句话：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就是说他们不是不想动手，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于是那些日子我一走进校园总觉得身前身后有目光在跟踪我，或者是在不怀好意地打量我，说不准什么时候会对我下手。这种感觉始终像一块阴云压在我心头一角。现在看来，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文革进行了四年，到时候了，中央是讲信用的。

紧接着，1970年3月27日上面又发下了《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我觉得有些疑惑，据说那是一个神秘组织，要填表要宣誓，类似于青洪帮的过香堂。可是“五一六”远在北京，上海没有，起码我院没有，这一点我可以保证。当分班讨论时，我把这个疑惑说了出来。我记得不久前看到过林彪的一个内部讲话，意思是部队里也有“五一六”，是穿着军装的“五一六”，有多少查多少，一个都不能漏。因此我发言道，为什么总把矛头对着学生？为什么不去揪那些穿着军装的“五一六”？我们连有十一个班，我在七班，班会是在宿舍里开的。我说话时鲍指导员并不在场。可是他像长了个顺风耳，我几乎话音刚落，他就宣布全连紧急集合，我们立即排着队坐进了连部礼堂。

鲍指导员兴奋得脸色呈紫酱红，两只脚左右交替不停地“稍息”。他鼻翼较大，也许患有炎症，每讲一句话总要吭一次鼻。这下他吭得特别响亮，接着说道：阶级斗争已进入白热化，七班蒋寄梦公然扬言要揪穿黄军装的“五一六”……过去指导员屡屡对我指桑骂槐，因为没有点名，我也不便发作，只好将一腔委屈咽进肚子里。今天他对我指名道姓，就等于把机会给了我，我顿时从凳子站起大声反问道：那么你说，部队里有“五一六”要不要揪？我接着又追问一边：你说要不要揪？！

指导员没料到我来这一手，也许他从军以来还未遇到过当众冒犯长官的部下，要是在战场上他一定会拔出手枪将我毙了以正军法，而此时他一时没了主张，吭吭几声却说不出话来，最后将手一挥：散会！

我亢奋了一阵子立刻后悔了。我并不后悔今天的表现，我公开迎战鲍指导员，是向公众表明我是一条好汉，而不是躲在别人身后的孬种，这个目的我达到了。我后悔的是没说到点子上。我在班上发言说的是穿军装的“五一六”，鲍指导员却替我加了一个“黄”字，成了穿黄军装的“五一六”。黄军装，黄皮，披着黄

皮的狼……这一招很损，一字之加，活脱脱勾画出了我的嘴脸，只有我这种对我们军队有着杀父之仇的人，才会有如此阴暗的心理。我没能及时辩诬，就等于是默认了，这从此成为我罪行中的经典，以后每当批判斗争，总要拿出来将我“黄”一下，直至我走完三年漫长的审查之路。

这件事很快汇报到了营部，营教导员将我传唤过去。教导员约莫有四五十岁年纪，显得老成持重。他见我进门，露出诧异的神色将我端详一番，再把情况问了问，然后说道：你看看自己什么料，胆大包天，敢同人民军队对抗！不知道他是训斥我，还是在警告我。我心里振振有辞：这不是听党话吗？从我受教育起，就接受了重在表现这个道理，想说啥说啥，想干啥干啥，不要背出身的包袱。怎么这个理到这里就不算数啦？——当然我这只在心里想，我还不不敢冒犯这位首长。

## “双十节”事件

营盘上空战云密布，一场政治搏杀即将开始，但双方实力极为悬殊，这与其说是对决，不如说是围歼，只要他们一抬脚，就可以把我像蚂蚁一样碾死。

这时候，我收到一封来信，竟然是从部队寄来的。通讯员为一个来自北京的学生，他显露出疑惑的神色，又认真核对了一遍，才将信递给我。

1964年我随学院去农村四清时，住在一户姓周的贫农家里，周贫农有个儿子比我小三岁，感情淳朴、秉性善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还同他保持着联系。当时工作组有纪律，不能与当地群众攀亲认故，所以运动进行之中他称我蒋同志，运动结束后他就叫我哥哥。在我下农场这会儿，贫农的儿子应征入了伍，他给我寄来一张照片，一样的帽徽领章，军装也是“黄”的。他很快乐，给了我一个无邪的笑，可他哪里知道可怜的哥哥此时正落入军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我忽然想，要是他被调到这里来对付我，他会怎样？或者说他去别的农场遇到了我这样的人，他又会怎样？他还会善良吗？

运动开展以来，已陆续有人自杀。上海音乐学院一个姓黄的同学自缢在厕所里，那是白天，人来人往，居然还成功了。我赶去时已被抬到厕所门外的泥地上，一名女军医正骑在他身上用力压他的胸膛，女军医累得满头是汗，黄同学却渐呈紫色，嘴巴张着，露出了两排雪白的牙齿。

又过了几天，钱塘江漂来一具女尸，是被我院表演系一位姓张的同学发现的，张同学勇敢地跳进波涛将她捞起，并抬放在岸堤上。可不知为什么曝晒了几天却没人来处理，于是参观女尸就成了人们饭后休闲的一个节目。我也在一个傍晚去了，围看者不少，有人将她身上盖着的芦席挪开，微笑地打量起她，还有人说了

一句俏皮话，博得了一片笑声。她身体被水浸泡，显得很臃肿，而裤带却紧紧地勒在腰上，几乎将她的身体断开。她同我年龄相仿，大概也是一名军垦学生。我想她在纵身跳江前一定非常痛苦，而这种痛苦不久将要降临到我的头上，但是我不愿选择自杀，因为我还不愿拿自己的身体供别人取乐。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这是古人一封劝降信中的话，劝对手珍惜人生时光，我这时候重读起来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贪婪地吸吮着钱塘江畔芬芳的春天气息，自知这样自由地呼吸已来日无多。江对岸，属萧山县境，可见一脉山势，错落有致。山本不高，因耸峙于水天一线，就显出了独有的身姿，无论晨昏晴雨，面貌各有不同，就像换了一身衣裳的姑娘，扑面给人一个清新。我想，就为这美丽的景致，我也要活着。

两个月过去了，似乎没有动静。一切都平静如常，甚至让我怀疑起他们可能会开恩放过我。一天吃完早饭，我同大家手提着农具排起队伍等待出工。我们排的陈排长走过来对我说，今天你不要去了，拿上毛选到连部办公室去一下。他的语气很温和，给我的感觉仿佛邀请我去出席一个会议。但是我听懂了“去一下”的意义。周围的同学一齐转向我，我班的一名战友默默地朝我点点头，我惨然一笑，算是同他告别。

这一天是1970年的4月21日。我之所以把这个日子记住，是因为历史有意安排了一个巧合——1964年，也是4月21日，我正在经历着一场革命的“受洗”仪式，我被批准加入了共青团。那时我们班团员不多，我是组织上作为贯彻阶级路线的成功范例被优先吸纳的。当时我们正在青浦开展四清运动，审批会场设在沈泾塘一座祠堂里，偌大的厅堂坐满了同学和教师。所谓阶级路线，分三层意思：一、有成分论；二、不唯成分论；三、重在政治表现。我将其精神溶于我的申请报告中进行现身说法，足足读了一个小时，全场鸦雀无声。读完报告，一位姓侯的美术教师，也是三代工人出身的党员，冲上来握住我的手说：太感动了，我差一点流泪了。

这一天是我人生的亮点，也是我革命道路的起点。哪想整整走了六年，这条道路今天走到了终点，日期相同，春光依旧，审批会却成了审查会。

走进连部办公室，一屋子的人正等着我。有连部领导，还有戏剧学院派来的几名工宣队员。一坐下，鲍指导员没说别的，叫我打开毛选第四卷，朗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读过了《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再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这两篇文章都颇有些篇幅，我的朗诵也很蹩脚，但是他们都很有耐心地听着我读。屋里的空气令人窒息，他们没一个说话，但我知道他们都没闲着。我被他们围在中间，仿佛也成了陈官庄中那个剿总司令，四面八方射来的全是充满敌意的目光，何况我对面的连长，正是从那场淮海战役中走来的（从国军那里解放过来的）。



自从在连部礼堂顶撞鲍指导员之后，我便有了接受审查的思想准备，并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斩断与所有造反派同学的联系，实行自我封闭。事实证明我做对了。交锋的第一个回合他们不问历史只查现行，追问我怎样与同伙们订立攻守同盟。我说没有。他们定是不信，对我日夜追逼。他们这一招其实很高，如果我们有秘密，必定要处理，以此突破，必能事半功倍奏得奇效。为此他们先不动手，将我放羊。他们是军人，懂得兵法，用的是欲擒故纵之计，给我时间处理秘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秘密，叫他们白费了心思。这一点余秋雨比他们看得准，余秋雨在《借我一生》中说我院造反派的一切行为，包括错误的行为都是在众目睽睽底下进行的。他们若是有余秋雨那点眼光，就不会把聪明才智如此地铺张浪费了。

但是有一个例外。有一天他们特地抽调人员将我团团围住问了一夜，直至金鸡报晓东方泛白，精兵强将们一个个七歪八倒，哈欠都打到了我脸上。我很有些不忍，真想拿点东西出去满足他们，可我实在拿不出来。我后来知道他们确实认真向我追讨着一个秘密——

我院的68届学生在江苏吴江农场劳动锻炼，数月前我们几个同学去看望他们，一伙人在太湖湖畔向当地农民买下了八只野鸭子，烹饪之后便划上一条小船举行野餐。青山媚，湖色新，涟漪动，熟鸭进，其中一位同学为将这快乐的日子留作纪念，问了当天的日期，忽地来了个幽默：嗨，今天是双十节！（上图：当年野鸭宴的珍贵留影。）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有一个同学把野鸭子吃进肚子，把这句话也记进了脑子，运动一起就向上面告发。材料转过来，军人大吃一惊，十月十日台湾那边的所谓国庆，共军怎么变成了国军？是谁策反了这一船的农垦战士？从档案上看，未发现船上这些人同国民党有什么瓜葛，于是把目光投向我，问题立刻清楚了。当年我父亲从大陆逃去台湾，又从台湾潜回大陆，一直把我带在身边，我那时虽然只有五岁，但阶级烙印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有其父必有其子，什么事都可能干得出来。

然而有了大胆的假设，求证还须小心，军人们很谨慎，他们不抛材料，整整一个晚上采取的都是启发式，他们想方设法将我从八只野鸭子引向政治，让我自己说出“双十节”这三个字。

十数双眼睛热切地看着我的嘴，只要我金口一开，此案便成铁案。可我哪里知道遥远的太湖曾经有人在船上幽过一默？近十小时过去，我仍然停留在吃的层

面上，连举行野餐的日子都牛头对不上马嘴。鲍指导员火了，他一下站起来点着我的鼻子学着我的上海话吼道：八牙子！（八只野鸭子）八牙子！我看今夜你的表演够充分了！鲍指导员说完就走，审问也终于告停。

我在这里被迫得昏天黑地，吴江农场那边也咬住了一个叫区国樑的同学。区国樑是我们一个系的，为人热情好客，见有朋自远方来，当即掏钱向当地渔民买来野鸭子，亲自煮熟了，将大家请上船去进行美妙的野餐。他也没想一想十月十日是什么日子，是不能随便请客的。区国樑出身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家庭，没更深的政治背景，加上他劳动表现好，军人对他的印象不坏。所以一开始就向他挑明：只要你承认那天野餐是蒋寄梦交代你办的，就放你过关。区国樑表示，他做过的事不会隐瞒，没有的事也不能编造。区国樑要做个诚实的人，需知那年头做诚实人是要付出代价的。军人将区国樑追逼了三天三夜，没让他睡觉。到了第四天，军人对他庄严宣布：说还是不说？最后给你半小时时间。

半小时过去了，区国樑没有说。军人又给了他五分钟。

五分钟过去了，区国樑还是没说。

军人忍无可忍将桌子重重地一拍，把区国樑关进了隔离室。区国樑一进隔离室倒头就睡，蚊子立刻将他的身体密密地盖了一层，等他翻个身，蚊子一哄而散，另一批蚊子又飞来将他密密盖住。农场位于湿地，那蚊子个个可比战斗机，等他清醒过来，浑身上下已没有一块好肉。

我后来知道，他们之所以这样认真向我们追讨秘密，其实真有一个惊天秘密。离下沙约十公里处，也属农场辖区，那地方有个诗情画意的地名叫“月牙湖”，驻扎着上海师院（今天的上海师大）67届农垦战士。运动一开始，该连队就揪出了一名造反派女生，批斗会开得异常激烈，会后还勒令她脱去棉袄站在寒夜里冻，她因此产生精神异常。那女生是中文系的，与我班一名同学在《解放日报》写作时认识，和我也见过一面，虽然没有讲话，但对我印象深刻，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的出身就是我的一张名片，只要一提起我，就立刻会想起我那可怕的家庭背景。

女生由于精神异常而产生幻觉，她将我们想象成一个与台湾政权相似的反革命集团，我姓蒋，于是为蒋总统，某某为总理，某某到外国大使馆送情报云云。黑字一落白纸，军人立刻奉为至宝。毛主席说过，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长期斗争的继续。复旦“孙悟空”算得了什么？这里才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

但可惜只是女生一人交代，还是孤证，要是区国樑认下“双十节”这个账，此案便有了有力旁证。但区国樑在这三天三夜的追逼中，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他知道不能松口，否则后患无穷。幸亏区国樑能够扛住，使我避免了一场大难。

那几个月公判大会隔三岔五地开，全中国都在开动机器进行规模化杀人，枉死者不计其数。以我“总统”之尊，难免也会当作祭坛上引人注目的牺牲品。

不过我又想，幸亏我是在部队，毕竟还讲点政策。也许他们左看右看，总觉得我还不像个“总统”；也许我当众顶撞鲍指导员时忽然透明了，不再那么云遮雾罩。所以陈排长在讨论我的案情时说，毕竟还年轻，能推能拉的，就拉一把。

这些军人的政策水平还表现在他们始终坚持文斗，避免暴力。运动以来革命群众对我没有任何的肢体接触，在农场也没坐过一次“喷气式飞机”。批斗会开始时还让我坐在凳子上，有群众一声吼，鲍指导员才“顺应民情”令我站起来示众，这是会前就排定了的，带有点戏剧性。运动中期农场办了个一打三反成果展览，我的出身加上罪行激怒了广大群众，特别是我对于三忠于的刻薄诅咒，更是伤害了人们对伟大领袖的淳朴感情。一天，几个新入伍的战士攥紧了拳头闯进我们连四处寻找我。我连的军人怕出事，赶快将我藏匿起来，接着他们学着阿庆嫂对付鬼子的办法哄走了小战士，使我免受了一次皮肉之苦。

### 一场虚惊

转眼已是浓春季节，别人都换上了单衣，可我还是觉得冷，仍披着一件棉袄。我被单独囚禁在朝北的一个棚屋，面壁而坐，勒令写交待。但是我时刻在倾听外面的动静。我知道我们这个战斗中形成的集体正在溃散，战友们一个个被枪挑落马，批判声口号声不绝于耳，只觉得山河破碎，满目凄凉。

一天夜里我被押了出来，只见外面军人密布气氛异常，场前屋后也设了岗，都是荷枪实弹的战士。一时间我感觉是被人押去法场，心想不好，这下小命不保。鲍指导员曾几次点着我的鼻子说：对你，不是办不办，要看怎么办！看来今夜真要将我办了，心头一沉，那腿也发了软。我被押进了连部办公室，只见正面一排人员，一个个正襟危坐，犹如城隍判官。抽烟的人不少，使得房间里烟雾笼罩，那气氛更显得森严。我被指定坐在一张小板凳上，由于害怕，身体缩成了一团。有人叫我的名字，我这才仰面看去，发现是一张陌生面孔，马脸长鼻，戴一副秀郎架，看似书生，却满脸的凶相。我不知道把我弄到这里来干什么，但我以前听说，犯人在处决前均要过一过堂，回答一两个问题，也称作最后的陈述，莫非我也到了这一步？果然，马脸将桌子一拍，问道：你还有什么没有交待的？我抖抖索索回答道：没了，我想到的都交待了，没想到的还在想。马脸冷笑一声：你这鸡毛蒜皮就算是交待？实话告诉你，边都没有擦到！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沉默。马脸又问：说，还是不说？我还是沉默。马脸突然一声怒吼：到今天还不老实！接着手一挥，把一样东西用力摔下，咕碌碌

直滚到我脚下，我吃了一惊，定睛看去，倒不是午时三刻问斩的竹签，而是一支香烟。是带过滤嘴的那种，当时算高档烟，长长的一截正冒着烟，没吸几口就这样扔了。

马脸一掷烟，我即被押出连部办公室。一人走前，一人居后，将我押在中间。我想，这下定要上刑场了，心里一慌，禁不住又走得脚高脚低。奇怪的是他们没把我朝旷野里带，转了个圈子把我押进了连部礼堂。礼堂内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大家又唱革命歌曲又是呼喊口号。接着指导员一声宣布，我们班的一个同学被押上了讲台。我这才知道今晚的主角是他，而我作为陪衬被玩了一把。

因为这个同学曾经在院革委会担任过主要职务，对他采取措施需要相应部门的批准，所以今晚除了学院工宣队，市里也来了人，马脸就是市革会的一名派员。三方进行认真研究，认为此同学不是一般人物，造反派神秘莫测，为保万无一失，就调来了武装战士，顺便对我施以一诈，冀能有意外的收获。

收获毕竟还是有了，他们从我的冥顽不化，或者从我的恐惧神色里，终于看出我们与台湾蒋帮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台海局势仍趋平静。于是他们决定调整思路，放弃有关国共两党主题，重新回到路线斗争这个层面，继续深挖“五一六”，将“一打三反”运动引向纵深。

然而下一个战役还没来得及打响，形势却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中央决定，学生一个不留全部撤离农场。

## 告别“再教育”

离开农场是大家盼望已久的事。早在半年前，就有同学抱个枕头在宿舍里游魂似地走来走去，嘴里不住嘟囔：回去喽！回去喽！叫得人心碎肠断。

士气涣散，人心思走，“再教育”面临严重危机，忽地来了个“一打三反”，才把军心压住。如今消息传开，营房内外一片欢腾，远在禁闭中的我也感受到了这种气氛，可我却没有丝毫快乐的心情。艺术院校离开农场回到原校继续进行文革运动，就是说我们这一批人还要被“处理”下去。除了关押点由棚屋改成水泥楼房，居住条件有所改善外，其余待遇均无改变。

不过我还是享受了一次特殊，我走在别人之先，并且有两名同学全程陪同。两人嘱我拿好自己的衣物，引导我爬上一辆军用卡车，车斗上只有我们三人，也算是我的专车。卡车一路颠簸西行，止于杭州火车站，然后我们再乘火车掉头向东，踏上回沪的旅程。

车票事前就买好的，为三人一排硬座，两人一左一右，把我夹在中间。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们三人都扮作普通的旅客，就像演一场戏，显得神秘神秘。

我后来看到日本一部电影《远山的呼唤》，很觉得亲切，我就是高仓健演的那个角色，只是没他那个艳遇，身边没个女子跟随。那两名男生都是表演专业的，表演自然到位，我同这两位男生并无过节，为让他们顺利当好这两名解差，我也配合默契，努力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来，致使整个车厢没人发现他们之中坐着一个在押人物。我对面一个小青年，也许坐得不耐烦，老想同我搭讪，每次都被两人巧妙地挡了回去。

第一个停靠站是临平，火车正在减速，我南望窗外，看到钱塘江对岸那座熟悉的山峦，依然一位羞怯的美人。这一带也叫余杭，为钱塘之门户。我们的农场下沙应该不远，晴空碧天，满目苍翠，春还未走尽。我忽然生出一种依恋之情，就是有点舍不得离开的意思。这情绪来得很突兀，我没能提防。我自从被审查以来没落过一滴泪，这时却两眼一热，几乎不能自持。

我想我还会回来，我一定还要再来，我忘不了这片土地，因为我在这里受到的教育，或者说再教育，远远胜过我以往所受到的任何教育。

---

【生逢乱世】

## 我所经历的“二月镇反”和“三月黑风”

王 锐

四川“二月镇反”始于1967年2月中下旬，但高潮期在3月。因此当时四川全省不管造反派，还是坊间，都习惯将那次局势突变称为“三月黑风”。

笔者身为造反派，不是“二月镇反”的直接受害者，却是亲历者和目击者。其间一些经历，可堪一记。

### 直升飞机飞临城市上空撒传单

我所在的四川自贡市，当年除了市武装部和一个公安中队、一所陆军医院外，没有正式驻军。武装部主要领导人，却公开支持市内造反派。

进入2月份，驻军就对造反派有了一些行动。有天，街上大字报栏突然贴出醒目标语和大字报：“强烈支持市武装部逮捕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自贡分团坏头头×××、×××！”才知道头天晚上驻军展开了捕人行动。

“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是临时工、合同工造反派建立的一个全国性组织，后因曾得到江青肯定一度名扬天下。江青那个讲话我也看到过，并深有触动，因为我当时就是一个没转正的合同工。幸亏我当时总体上比

较保守，没有离开单位去介入形形色色临时工、合同工造反组织（多少都与“全红总”有牵涉），这首次逮捕造反派，我纯是旁观者。

我是1965年5月到市卫生局上班的。我能进卫生局这种市级机关，纯属偶然，也是运气。其时我等“社青”，几乎全被安排到区办集体企业就业（我初高中同班之亲哥入区木器社至退休）。1965年大局升平，市卫生局奉指示加强卫生宣传，组建卫生宣传机构，办街头宣传栏及一份卫生小报。需写美术字及画插图美工，找文化馆荐人。我自学过绘画，1964年下半年起在区文化馆尽义务，协助馆内那美工，写欢呼原子弹爆炸及赫鲁晓夫下台之类街头大标语。那美工与我关系很好，推荐了我。本该一年后1966年5月转正成“以工代干”正式职工，但文革起，转正事停。身份始终是合同工，一直到1971年“三工转正”。

1967年2月中旬，全市已是造反派天下。有天，在市内一家国营盐厂当车间统计员的父亲回家（父母均在该盐厂，不每晚回家），在饭桌上谈到一个消息，让我深觉意外。

父亲说，有人从成都带回来的消息，毛号召“军队支左”后，省城造反派曾结队到成都军区，结果吃了闭门羹。而“产业军”到成都军区，受敲锣打鼓欢迎。

“成都军区怎么会支持产业军呢？”这是我和父亲脑子里的共同疑问。

“产业军”是成都有名的“保字号”组织。我心里疑惑，也怀疑父亲的消息不确。其时通讯交通差，我们那个城市虽为省辖市，但消息闭塞，比成渝两地差太远。我虽是造反团勤务员，对省城的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和川大“8·26”围攻成都军区这类重大事件，基本无知。

记得是2月中旬一天（后获知是2月18日），我正在卫生局院子里，突然天上响起飞机轰鸣声，而且响声巨大。院子外面有人在喊：“直升飞机，直升飞机！”那时光临自贡这种地方的飞机极少，何况是直升飞机。

巷子里又响起叫喊声：“快看，撒传单！直升飞机在撒传单！”

院子里的人都涌出去，包括楼上住的“重庆8·15驻自贡联络站”的人。当年的市卫生局，在牛氏巷的一幢民国小洋楼内。楼上原是卫生党委机关及“局长室”，地板及楼梯全木质且高档。年前10月，被“8·15”学生进驻作为“驻自贡联络站”。

我随人一起往巷子上头跑，一气跑到解放路小学门口。那里较空旷，地势又高。抬头望去，一架军用直升机在上空盘旋。无数纸片如同“天女散花”，随风飘飞撒落。这场景，仅电影中见过。以我经历，是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市民轰动了。高声大喊，纷纷抢传单。我动作还算迅速，抢到一张。小16开印刷纸，略黄，纸质不太好。传单内容正是四川文革史上赫赫有名的“中央军委2·17信件”。

看这份传单，才知道了省城发生的冲击成都军区事件。当时完全没意识到，这封语气用词也不太严厉的“公开信”（对“兵团”和川大“8·26”甚至还称“同志”），会产生那么大的作用。它直接敲响了全川造反派的“丧钟”，揭开了“二月镇反”序幕。

后来，我研究这段史实得知，其时不仅是自贡市，全川各主要地市，军方都派出飞机撒传单。两天之内，共投放了80万份传单。作出派军用直升机撒传单这种前所未有重大决策的，是其时主持成都军区工作的副司令员韦杰。

## 独立团进驻自贡

“2·17信件”发出的当天，成都即开始捕人。所捕对象开始是“2·17信件”中提及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8·26战斗团及其与之联系密切的造反组织。不久，打击范围扩大，连一般造反组织成员也捕。

自贡不是这次“2·17信件”事发地，看了传单，我和多数市民的本能反应是：“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和川大‘8·26’这次可能遭了，但与我没有什么关系。”

没料事态发展，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自贡捕人比省城晚，3月上旬开始。被捕者先是全市一些名声响亮且势大的造反团头头和骨干，清一色属市民称为“老造反”那些人。还有就是其本人或家庭有明显“历史问题”那类。再后来，扩大到一般成员。

但最大的变化在于驻军身份的变化。各类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自贡部队”名义发布的“公告”、“通令”、“告全市人民书”等，张贴于大街小巷。但这时的驻军，已不是当初的自贡市武装部，而是从相邻的内江调过来的独立团（受成都军区指挥）。原来的“自贡驻军”负责人，也成了“镇反”的打击对象。自贡武装部已被独立团接管并改组。

大约是3月中旬，一个下午，军方发出通知，让全市机关干部在市委大礼堂听驻军首长报告。我虽是合同工，也享受了“机关干部”待遇。千人大礼堂座无虚席，气氛却紧张。礼堂大门口及台上两边，均有持枪士兵值守。真正“枪杆子下的报告”。作报告者，正是从内江军分区来的军分区副司令员刘尚武。

从台下远远望去，刘尚武身材魁梧，微胖，微黑，标准军人形象。目光威严，讲话口气很厉害，甚至粗鲁。那天报告，概括一句话，就是“镇反动员”。

这位刘司令员，报告中历数造反派种种“反革命行为”。记得最清楚的一个细节是，在历数“罪行”时，提到自贡居然还有什么“硬骨头战斗团”。接下来，刘司令拍着讲台，发着怒朝台下的上千市级机关干部咆哮：

“什么硬骨头？我看你就是软骨头、贼骨头！我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

把你这些反革命分子的骨头，通通砸碎砸烂！砸成他妈的碎骨头、烂骨头！”

实在说，这番杀气腾腾的话，听得在座者胆战心惊（不管是不是造反派）。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刘尚武这几句话说完，会场静默片刻，不知谁领头，全场竟爆发掌声，且经久不息。

多少年来，忆那情景，我总在心里琢磨掌声从何而起。刘某极出格，不管带表演性质还是真实内心状态，为何竟能获全场掌声，而且“经久不息”？看来，人性实在有点不可知。

据我所知，台下上千机关干部，其中不乏老资格。我所在的卫生局一副局长，就是1934年参军入党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一样坐台下听他怒骂。刘某那旁若无人，唯我独尊的拍桌子咆哮，让人不免想起电影中见过的旧军阀（而且是小军阀，不入流那种）。

然而，历史发展实在出人意料。仅仅一两个月，局势大变，这位曾经趾高气扬，指挥军警疯狂捕人抓人的刘副司令员，灰溜溜带着独立团部队离开自贡。

这还不是最后结尾。以后，清算“二月镇反”问题，刘被迫做了检查。但自贡造反派和公众仍然不依。改组后的成都军区领导人最终同意，让刘尚武回自贡，“向自贡人民作检查”。

大概是当年6月，刘被押回自贡批判那天，我也有幸在场。与在市委礼堂作报告模样相比，刘司令判若两人。他身穿军便服，没有军帽、领章之类，低头呆呆站在那里，神情沮丧，人也仿佛变得矮小了许多。仅仅三两个月，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这件事，给我最深感触就是，一个人无论处在何种得意情形，都不可太过张狂忘形。

### 进入市生产指挥部农村工作组“避风”

独立团驻军进驻后，市内形势越来越紧张。当初设于闹市区十字口广场（文革时更名“英雄口”），市内最高建筑自贡饭店顶楼上的“炮打司令部广播台”，是市红卫兵造反司令部所设。一直以来，成了市民普遍关注时局的“风向标”。不久，被驻军当局封闭接管，每天例行播音的高音喇叭，突然安静了下来，让市民一时似乎还难以适应。

相对应的却是，自贡饭店大楼街对面的市二轻局仅四层的办公楼，顶楼是个大平台。独立团进驻后，即在二轻局大楼平台上设了武装岗哨，昼夜值守。所有从十字口广场（文革以来，从街头辩论到一些大会均在此举行）经过的行人，稍抬头，即可望见那些持枪武装士兵，正监视着大街。行人车辆一举一动，都在武



装士兵注视之中。这有点类似监狱看守所和劳改场地，让人周身很不自在。只想匆匆低头走过，让自己尽快离开士兵监视。生怕有什么不当，遭到那些士兵开枪。每天我去卫生局上下班，走过那街口，都是如此心理。那平时总是热闹非凡、人头攒动，全市唯一的街头小广场，那一阵行人稀少，顿显冷清。

我当时是局里造反团的“二号勤务员”，虽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摆样子，也从来没一点恶行或出格，但毕竟是造反派，而且做了“勤务员”，大势如此，心里自感压力。

3月初，正好有一个通知下来，市里成立了“生产指挥部”，准备往农村派工作组，督促眼下春耕生产。要求卫生局派一名干部参加。其时，卫生局虽未正式宣布夺权，但也已经由造反派掌权。原在外面搞“四清”的一名普通干部，回局当了“一号勤务员”。得此消息，我当即向主事的“一号勤务员”提出，我愿意下乡。他想了想，竟然同意了。由此，我不仅在非常时期暂离原单位是非地，到乡下逍遥一个多月，而且，有了充当工作组的一员一番颇值回忆的经历。

第二天，我就去市生产指挥部报到。生产指挥部就设在市人委（市政府）办公楼，与卫生局仅一巷之隔。后来才知晓，这个市生产指挥部，是军方按成都军区负责人的指示建立的，专门负责当前“春耕生产”。对外表明，军方主政后，不仅搞“镇反”，也抓生产，尤其农村眼下的春耕。在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3月7日，又发出《关于农村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春耕生产期间不要夺权的通知》，都强调了“春耕生产”。

不过，以我在这个市生产指挥部一个多月的经历，军方建这个机构，作这种安排，仅仅是对上做做样子，根本没当回事。其重中之重，仍在持续大规模捕人“镇反”。

这个市生产指挥部，由一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国××负责，好像军方有三两个人象征性参加。像我这样，从各市级机关抽调的机关干部，也就四五十个人样子，比起其时动员组织成千上万人夜以继日轰轰烈烈搞“镇反”，小指头也算不上（捕自贡二中造反学生头头那晚，军方组织了上万军警民兵及机关干部，内外三层围校封路。因二中造反学生有数千人）。而且，关键在于，这个生产指挥部除了派人下乡了解春耕情况，回来汇报外，没有任何一点实际权力。

我们这批人报到集中后，由这位国书记（好像还有军方代表）召集开了一次会，然后就分组分派下乡地点名单。我被分配到与内江地区相邻的胜利公社。

同我一组的是个女孩，年龄比我稍大一点，短发，稍矮稍胖，眼睛很大很亮。名字我已经忘了，好像是从市轻工局一个下属单位抽调来的。分组后的第二天，我们这些人都分头下到公社。

## “世外桃源”般的乡下日子

胜利公社驻地距市区大约 20 来公里，正在自贡通内江的国道公路旁边。可是当时不通公交车，到公社驻地，只能先坐公交车到距市区 10 余公里的大山铺。剩下的那 10 公里左右的路程，只能沿公路步行。正常速度，得走两个小时。

那时的下派工作组，讲的是“三同”，即与农村干部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那次，劳动免了（下大队和生产队田间地头跑路是免不了的），“同吃同住”，却是必须的。

虽是文革高潮混乱时期，公社领导班子好像还能正常运作。对我一男一女两个小青年，虽知属于“不明世事”那种，但有着“市里工作组”这种身份，还是尊重，接待也很热情。住宿，安排两间有门有窗，还算过得去的屋子，有单人木床及简单家具，而且各住单间，不与他人同住。在当年农村，算是很优待了。吃饭，则在公社食堂，自买饭菜票，享受公社干部待遇。

只是，个人得带被盖、床单、脸盆，包括茶盅等用品。无车。我与那女孩是如何将这些东西搬到公社，工作组结束又如何扛回市区的，已全无一点记忆。依稀有点印象的就是，每个星期六下午，吃过中午饭，我和那女孩就相约，从公社驻地沿那条国道，一路步行两个小时，抵达大山铺场镇车站等候班车。好不容易等来一趟公交车，再花几十分钟回到市区。星期天下午或是星期一早上，再如是公交车加两小时步行，返公社驻地。

乡下的日子悠闲而单调。我们这工作组，基本没带任务和指令，除了集中时的那次布置，以及最后的一次总结汇报外，印象中，没让我们这些下乡人员返市指挥部作汇报，或是新布置交待什么工作。所有使命，大致就是督促下面春耕工作，并将底下情况带上来。如此而已。所以说，这个市里派出的工作组，实际上是可有可无。下面好像也没把我们当好大回事。只不过有什么会议或研究布置点事情，客气请我们到场参加而已。

有时，也例行让我俩发表点意见。我能讲出点什么？就说没有意见。那女孩见我不讲，更是说没有。

那个公社驻地，虽在公路边上，但处于自贡市大山铺和内江的凌家场两个场镇中间，各距 10 公里左右，真正是“前不挨村，后不挨店”。附近连最小那种商店、饭馆都没有一家。天气好时，有农民背一捆甘蔗到大院门前坝子里卖，算是唯一可购的商品。

公社机关是一个大的农家院子，皆青瓦平房，最常见的那种老式混砖楼房也没一栋。真正“一穷二白”到家了。空闲时没有电视电影可看不说，连报纸也难见一份。有线广播好像有，但其时是非常时期，似乎也没听到过什么广播。

公社干部，下班后有家的回家。家不在当地或是离家较远不便回家者，吃住均在那个大院里，也难见有什么消遣娱乐活动。如今流行天下，四处开花的麻将，在文革前就不常见，文革开始就被视为“四旧”给禁止了。

唯一消闲打发时光的，就是于公路或是田间小路散步，看看春意盎然的田园风光。更多时候，是回到自己房里，关起门读一点自己带来的闲书。我不知道同来那女孩喜不喜欢读书，言谈中，似乎不像对书籍尤其是文学作品感兴趣者。由此，我也就不知道，每天回到她那房间里（尤其夜晚），她个人究竟在干点什么，如何打发那般漫长寂寞无趣时光的？

那时的年轻人，本份而单纯，男女之间接触交往，礼貌而极有分寸。有时饭后无事，我俩也会掏零钱买点甘蔗，然后分一截给对方，两个人一边吃甘蔗，一边在公路上任意走走，随便聊点什么。那年，我22岁半，没有女朋友，也尚无恋爱经历。那女孩，可能比我稍大一岁，也未成家，有没有男朋友我不知道。从来不问，也未聊及这方面事情。但平时两人之间接触往来，很是坦然。起码在我，从未有过任何男女之情方面的念头，她对我，好像也没有什么防范之心。彼此都相处得很好，很平常自然。

一直到我们一个多月后分手各自回单位，我也不知道女孩在单位是干什么的，家住何处，家庭情形如何。她又是如何派到生产指挥部分配下乡的？平时与她闲谈中，隐约感觉她好像也是“造反派”（起码造反派观点），是不是像我一样，在“镇反”高压下想逃避现实，躲到乡下来求宁静？都不知道，也不方便过问。也真是奇怪，回归单位后这许多年，尽管同处一个城市，那么一个小地方，似乎我再也没见过她。一次也没有。当年那一段有限相处时光，就此存留在记忆中，属于比较美好的那种记忆。

那一个多月，城市里面四处散发着紧张和大祸临头的气息，驻军主导下的对造反派报复性的镇压，大逮捕大批斗场景，似乎离我很远。真正是“眼不见，心不烦”。我平时连单位也从来不回，个人在乡下过着寂寞却安静的日子。那里没人管我，追查我是不是造反派。

### 卫生局科长被捕

乡下日子宁静悠闲让人心安。但心里面，对时局还是关心，尤其想从一些动态了解下一步方向。周末回城，同家人聚一聚，以及同学朋友相逢一谈，所听到的，都是“镇反”加速，以及被压垮的“五军一兵”（市民对几大保守组织的简称）又重新抬头，那些人趾高气扬，为军方及公安逮捕镇压造反派当“线人”打手的消息。

有个星期天，我逛街，顺便走滨江路，沿釜溪河散心。远远看见两卡车迎面过来，车前立着几个人。其时春寒料峭，河边风大。我在想，这几个人还怕冷，敢挺立车头吹寒风。

及至两卡车驶近，我才看清，车厢前方挺立着的几个人被绳索五花大绑，周围有持枪的士兵押着。原来是军方押送逮捕的造反派人员。

卡车从身边飞驰而过，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卡车上被绑着那些人，甚至有种大义凛然样子。有点像电影中所见被捕共产党员形象，有为“革命理想”从容入狱，甚至从容赴刑场的气概。我想，当年被捕的多数造反派心中，可能正怀有如此心理。因为他们认定自己是在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造反”，是在保卫“毛的革命路线”。虽“坐牢犹荣”，虽死更是“犹荣”。

军方捕人已从黑夜进行，转到白天公开行动，且招摇过市，说明“镇反”的规模声势，已达空前地步。有消息说，五云村（有名监狱）已人满为患，当局正在安排新的关人地点。

有个周末返家，终于听到了卫生局同事被捕的消息。

被捕者姓兰，是卫生局医疗预防科科长，当时局机关唯一有大学文凭的干部。兰科长既不是局造反团头头，连一般成员也不是，他却是局干部中最先“揭竿而起”的“老造反”。

我是局造反团成员，知道兰科长虽为局内最早“老造反”，但造反团一直在排斥他，不让他参加。原因是，兰科长身上有“国民党少校军医”这种身份。局造反团为自保，力求“组织纯洁”，始终拒绝其加入。兰科长就成了游离于造反组织之外的“老造反”。

这位兰科长时年40多岁，身材瘦高，脸型也瘦，脸色白皙中带点红润，长年如此，不知是否喝酒的缘故。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门牙中有两颗暴牙，说话就很显眼。

兰科长管的那个科，是卫生局最主要的科，但他似乎却没什么权力，因他不是党员，又有旧军医那种身份。他平时对人很和气，经常笑嘻嘻的，对我这个小小的合同工也不例外。他是安徽人或者江苏人，说话口音有时让人不太好懂。

文革中，兰科长最早起来造反是有深层原因的。他平时不受信任，遭歧视，趁文革起来出口气，大概算是远因。近因，却是文革之初干部“排队”时，据说他被排为“三类”。流传的说法，“批三斗四”，而且运动后期一定会“组织处理”。所以，如当年陈胜吴广处境一样，不反是死，起来造反也是死，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可以说这是文革中多数“老造反”的实际处境和心态。全卫生局，正是这位兰科长首先举起“造反”大旗。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大都是随潮流的“骑墙派”，有些人更是“摘桃派”。

文革局势反复，大搞“镇反”，兰科长那种经历，自然首先成了“镇反”对象。他不是任何造反团成员，也因有过“造反”经历而被捕。这种荒谬逻辑，在当时主持“镇反”的人看来，却很正常。而且，就此可证“造反派都是牛鬼蛇神，社会渣滓”这种认定。

兰科长被捕后，在监狱中关了一个多月，直到4月底，大概是属于被捕造反派释放最晚那批之列。

我记得很清楚的是，4月30日或是5月1日，我已从乡下回到局里。那时，造反派全面复出。这天接到通知，各造反派去十字口广场集会。这是“二月镇反”后首次造反派全市大会，大家都兴致勃勃，心想造反派终于又翻身了。

卫生局造反团翻出被收缴的造反团大旗，由我高举（当时我算造反团唯一年轻人），10多个造反团战士去广场赴会。走在大街上，正碰见刚出狱的兰科长笑嘻嘻迎面而来。惊喜之中，带着点“造反派终于又出头了”的心态，彼此亲热握手，问候一番才分手。

当然，由于他“国民党少校军医”那种身份，局机关造反团上下，始终对这位“老造反”兰科长保持着距离。不仅拒绝其加入，有时甚至还彼此闹出些不愉快。

兰科长被释放后，我听他在一次局干部学习会上当众介绍过他那段“国民党少校军医”经历。他是有意讲出来的，以便让不了解或是有误解的人了解。

他说，当年大学毕业，是为了混口饭吃，才到的那家医院当一名医生。后来按级别套用军衔，评了个少校军医。如此而已。他始终是个医生，没介入政治，也未参加过国共战争，更未反对过共产党。算什么“历史反革命”？

他当场质问“三月黑风”中与士兵公安一起来逮捕他的那两个卫生局同事（一人任机关战斗军军长，另一人任师长，都是“镇反”积极分子）说：“那个时候我要找个饭碗吃饭呀，不找饭碗就要饿死。找个饭碗吃饭也有罪？就成了反革命？世界上哪有这种道理？”

## 亲历公社“镇反之夜”

从“2·17信件”以来，市里几个城区“镇反”搞得轰轰烈烈，但广大的乡下农村，似乎却风平浪静，让我感到像“世外桃源”。当时我心想，农村文革也没怎么闹，可能不会“镇反”吧。然而，我这种想法太过天真了。

大概3月下旬，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公社大院里，突然通知让我和那女孩参加一个会议。开会地点在一间办公室。去了才知道，这是一次研究当晚在全公社展开“镇反”捕人的情况通报会，以及部署和实施方案的准备会。与会者大概就

10 来个人。

按理说，这是相当机密的事情。因为行动就定到当晚深夜开始，整个公社境内全面展开。离行动时间还有 10 来个小时，自然存在通风报信，走漏风声的可能。所以说，这应当是少数核心圈子才知晓，具有相当机密性质的会议。

也许是考虑到我们“市里派来的工作组”这种身份，竟然让我俩也列席了这种机密会议。我们去时，那些人都坐在那里（说不定已经开了一会儿）。可能是开会时见我们没在，主持会议的那位公社书记，觉得有些不妥，又派人通知我俩参加。

说是开会，其实整个过程，基本上就是那位驻公社的公安特派员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他大概才从区上或是市里回来，传达布置市里或区里展开的统一行动，于当晚逮捕公社造反派头头及骨干。

这位公安特派员平时在公社大院里，尤其食堂吃饭时经常见到，年轻，大概 30 来岁，身材偏瘦，基本着便装，不介绍还看不出那种公安警察的特殊身份。彼此不明底细，对我这个“市里下来的”，倒也还客气，碰见了，互相点个头，算是招呼，却没更多交道。

这天会上，这位驻社公安先是传达上级指令，说是这晚区里统一行动，农村各公社对造反派中的“反革命头头”和骨干实施抓捕。被捕对象名单，可能他们前期摸底就已经拟议好了，且已获上面批准或是商议过。第一批大概是 10 余人。

听了这位公安特派员的一番介绍，我才知道，这个胜利公社的造反团，好像是叫“坚强造反团”，全公社是一个总团，下面各大队有分团。总人数达 1000 多人。这数字叫我吃惊。1000 多成员的造反团，若是放在市区，是很大一股势力。实在没想到农村里面，仅仅一个公社的造反派有如此之众！

这位公安特派员讲了捕人的各方布置准备，又望了望大家，说：

“虽然作了充分准备，但还是应当把情况往复杂方面想。毕竟，这个‘坚强’造反团，有一千多成员，如果一千多人闹起事，不让我们捕人，或是阻挠我们的逮捕行动，还是会有麻烦的。我们应当把困难设想得多些，有所准备。”

接下来，这位驻社公安讲了一番让我印象深刻、至今难忘的话。这些话，肯定不是他的发明，是传达上面的精神。

他说：“下去逮捕人时，若是有人阻拦，哪个阻拦，就先捕哪个。如果当时我们的人手不够，现场捕不了，就将他的名字在心里记下来，这次逮捕行动结束后，再来逮捕。记住，不管有多少人想阻拦，都用眼睛看清楚了，心里记住就行了。哪怕他没有直接阻拦，但样子不满，想阻拦，或是说了什么不满的话。大家要通通都记下来，下来再找他算账！”

听着这番话，我心里一直在琢磨。我相信这可能就是专政机关一贯的策略，

有些事，当场不露声色或不便露声色，但心里有本账，过一阵再“秋后算账”。而且，我相信这些原则手法，至今对付一些事件时，仍在继续使用。不过，这种“过后指认追罪”的手段，会不会伤及无辜？或被一些人利用，有意胡乱指认？

经过这个会议，我深深感到，表面上平静如常，被我视作世外桃源的乡下，其实也是暗流汹涌，颇藏凶险。只不过我等是局外人，又有“市工作组”这种外衣，一时感觉不到吧。

当晚，我等未被告知有什么安排，自己同这些被捕者一个不识，也不存在什么瓜葛，到时就照睡不误。

不料，半夜时分，响起了敲门声。我听出是与我同来的那女孩，在轻声喊我起来。

我匆匆穿上衣服开门。那女孩对我说：“×书记叫你也去一下。”

此刻正是深夜，春寒甚重。未及多想，我匆匆抓一件外衣披在身上，随女孩穿过院子，来到一间亮着灯光的大屋。

### 被捕者的“求情”被拒

我猜想，主持工作的×书记，大概觉得如此大事，市里来的工作组成员不在场，似乎不好，又临时叫醒我们，来现场亲历一下，看一看情况。

其时，已捕到了几个人。我一进屋，就看见大屋子一角，地上几个人五花大绑，跪着或是坐着缩成一团，随便丢在那里。

见我们进来，×书记望我点点头，招呼一声，说：“你们还是来一下好。”

我感觉他是带着善意。不过，我们确是什么也参与不了，只能呆在那里，充当“陪客”。

现场气氛有点紧张，也有点压抑。捕人者和被捕者都不说话，只是默默行动。那位30来岁公安特派员，才是今晚行动的主宰和实际指挥者，也一脸严肃，又很有使命感样子，与平时看见的他全然不同。

他不停地进进出出，处理各种细节，不理睬待在一边的我们（最初看见我们那一刻是否打过招呼，我也没印象了）。一切都在有条不紊，按他们先前拟订的方案进行着。

好像也没发生什么意外。比如说遭遇阻拦和抵抗，该捕的人没有捕到等等。

陆续又有被捕造反派被带进来，仍是五花大绑，丢在那个角落。这些被捕者，公安员、公社干部们可能是认识的，却没一人讲过点什么话。

似乎逐渐进入到逮捕行动的尾声。×书记及其他人（好像有区里派来的人）先后出去了。屋里仅剩我和那女孩，公安特派员。这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这

细节，让我终生难忘。

因夜寒，我出门临时披了件风衣在身上。那风衣其实是我父亲的，米黄色，大半新旧。1965年末1966年初，我随局里干部到边远的荣边公社劳动，“改田改土”一个多月，也带着这件风衣。既可遮雨避风，睡觉又可加在被盖上保暖御寒，用处很大。这次下乡就又带上了。

这种风衣装束，当年城市也很难见，何况在农村。一看就知道是从市里下来的。我又没说话，让不了解情况者看来，更像是主事的人。

就此，可能给当晚的被捕者造成错觉，认为我是上级专门派下来主持“镇反”抓人的。

在屋子里呆了一阵，我发觉角落里那几个被五花大绑着的被捕者中，有人拿眼睛一直在往我这里望。终于，在屋子里只剩下我这几个人后，那人稍抬起身子，望望我，又望望那公安特派员，说了句：

“可不可以，把绳子给套松一点？”

那人见这边没有什么反应，又稍大点声音，补充一句：

“人都逮到这里来了嘛，要跑也跑不脱。捆得太紧了，手遭不住，可不可以捆松一点？”

说完这些话，又一直拿眼睛往我脸上望。看样子，真以为我是“关火”的，可以发话为他松点绑。

听见这话，我又羞愧又无奈。心里想说的是，跟我说有什么用？我哪作得了主？又转念头道，其实我也是造反派，说不定到时候，自身也难保，哪里有资格为你松绑？

心里转着这些念头，却不敢有任何表示，装着什么也没听见。与我同来那女孩也是如此。那公安特派员也没做声，一直忙他自己的事。只不过，脸上似乎浮着不易察觉的一丝冷笑。那被捆着的造反派，见“求情”无望，也没再出声了。

这一幕，几十年来一直存在我记忆中。那番情景，每每让我感慨不已，也始终对那位不知名的“求情者”，心存一分歉意。

后来见文革小报上回忆文章中，谈到当年“二月镇反”被捕者遭遇，也确有手腕被捆得伤痕累累，甚至弄残的事情。那些士兵、公安，乃至民兵，及所谓“革命群众”，已将对方当“反革命”对待，确实很难让他们“手下留情”，所谓“人道主义”，更是奢望。

“二月大镇反”终于祸及农村。后来见到揭发材料，都是主持其事的成都军区负责人（主要是副司令员韦杰为首），意图将“镇反”扩大化、纵深化的结果。他当时在听取各地汇报并发布指示时，一再强调，前阶段“镇反”虽取得一定成绩，但发展不平衡。应向边远地区，交通不便的地区，广大农村发展，把“落后



地区”带动起来。

我所在的胜利公社，印象中好像就搞了这样一次全公社范围的大逮捕。估计按省市要求和当地安排部署，应该还会有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捕人行动。

可惜到4月初，随着中央对四川“镇反”问题的关注，全国文革局势再变。直接信号是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文件出台，以及《人民日报》4月2日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发表。仅自贡市来说，4月初，被打压的造反派活动转入公开，整个局势迎来大逆转已成可能。自贡的捕人举动，在3月底4月初被迫停止。否则，不管我所在的原单位卫生局，或是暂时去的胜利公社，将会有更多造反派被捕。会不会最终牵涉到我自己身上，也的确难说。

局势变化以后，市生产指挥部自身也难保，匆匆将我们这些乡下工作组召回，集中听了一次汇报后遣散，各回原单位。

“二月镇反”或“三月黑风”，这时已落下帷幕，并逐步遭造反派清算。

2011年6月自贡“危楼书屋”

2015年12月改毕

---

## 【争鸣】

### 关于《乱世狂女》和“奉陪到底”等问题的说明

艾 群

作者简介：艾群，男，1963年至196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历任公安部人民公安报社副总编辑、公安部群众出版社总编辑，2005年退休。高级记者，一级警监。出版著作有《凤凰餐厅的怪客》《京都预审官》《使用化名的女人》《笔走龙蛇》《沈崇事件真相》《首都师大附中百年史话》以及戏曲《瓜园客》《血溅佛堂》（合著），电视剧《京都预审员》等。

《昨天》第61期刊载杜钧福关于文革研究的文章，其中谈到对聂元梓“有人出了一本《乱世狂女》的书予以丑化”，“一位‘国学大师’仍称她为‘破鞋’，集体的无意识把一切脏水泼向这个可怜（但不是无辜）的女人”；还谈到“所以李雪峰在回忆录中叙述内容很不可信，包括那个莫名其妙的‘奉陪到底’”。

我于1963年9月至1968年12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经历了北大文革最热闹的几年，毕业后发表过一些关于北大文革的文章，兹就杜文上述几个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 一、《乱世狂女》丑化了聂元梓吗？

杜先生在《文革梦魇隐于何处》一文中称：“聂元梓有她的问题，但关键的当然还是这个大字报问题。由于这个问题，她一直被妖魔化。有人出了一本《乱世狂女》的书予以丑化，一位‘国学大师’仍称她为‘破鞋’，集体的无意识把一切脏水拨向这个可怜（但不是无辜）的女人，尽管她已服了十几年的刑，为她所做的坏事承担了后果。”

从北大毕业后，上世纪80年代我在公安部人民公安报社供职，于1986年根据聂元梓的审理案卷，写出一篇两万余字的文章，题为《写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交付一家期刊，该刊发表时由编辑部改拟标题为《乱世狂女——聂元梓》，此后有几家报刊转载摘登，所拟标题略有不同；其间一家出版社选编了一部法制内容的文集，也将该文选入，并以《乱世狂女》为该书书名。全书30余万字，《乱世狂女——聂元梓》一文不到十分之一篇幅。严格地说《乱世狂女》不是一本书，而是一篇文章。

标题《写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与书名《乱世狂女》的不同在于，前者是“实题”，语义精确；后者是“虚题”，语义笼统。乱世狂女换成直白文字就是“十年动乱中的猖狂女人”，对号入座，首先非江青莫属，其次才是聂元梓。但是无论“实题”还是“虚题”，对于聂元梓来说都是名副其实、恰如其分。

再说内容。《写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即《乱世狂女——聂元梓》一文主要记述了聂元梓的身世、写第一张大字报的经过、对北大工作组的态度、去上海串联造反、组织“揪叛徒”、组织反朱德、炮打邓小平以及所谓的“刺杀聂元梓事件”等。所述内容取材于聂元梓在押期间的讯问笔录即口供，并参照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等审理案卷，同时适当采用我本人对聂元梓的亲见亲闻。**全文无一事无根据，无一字无出处**，所有内容没有任何歪曲、夸大或捏造；知情者均反映该文“客观真实”。此后聂元梓著《聂元梓回忆录》于2005年出版，《写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即《乱世狂女——聂元梓》与其对照，两者所述事实件件相符，完全没有对聂元梓“予以丑化”、“妖魔化”和泼“脏水”的问题。

《写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即《乱世狂女——聂元梓》中一些文字表露了作者对聂元梓文革行为的谴责和嘲讽，这属于作者的态度和修辞手段，与事实无涉。时至今日，我对文革的认识愈趋深刻，再写那些内容，文笔风格肯定会与当年有所不同，但是我对聂元梓文革行为的谴责与嘲讽定然不会改变。

尽管如此，《写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即刊出文章《乱世狂女——聂元梓》

也用了—个章节的内容（第七章“也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对同时又是文革受害者的聂元梓表示同情。

请注意，我们面对的是两个聂元梓——文化大革命聂元梓和刑满释放聂元梓。对于前者，必须批判与谴责；对于后者，可以同情与帮助；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 二、“国学大师”向聂元梓泼脏水了吗？

杜先生在《文革梦魇隐于何处》一文中指责：“一位‘国学大师’仍称她为‘破鞋’，集体的无意识把一切脏水泼向这个可怜（但不是无辜）的女人，尽管她已服了十几年的刑，为她所做的坏事承担了后果。”

据我所知，与“国学大师”和“仍称她为‘破鞋’”这两个条件相对应的是季羨林著《牛棚杂忆》一书，该书（手稿本）涉及“破鞋”的文字大致如下：

“这真正是你死我活的搏斗，但中间也不缺少令人解颐的插曲。主斗者都是青年学生，他们还没有完全脱离孩子气。他们的一些举动几近儿戏。比如有一次，两派正在大饭厅里召开大会进行辩论。唇枪舌剑，充满了火药味。两派群众高呼助威，气氛十分紧张、严肃。正当辩论到紧急关头，忽然从大饭厅支撑住屋顶的大木梁上，嘭地一声，掉下来了一串破鞋。‘破鞋’是什么意思，我国人民，至少是北方，都明白的。那一位‘老佛爷’就有这样一个绰号。事实真伪，我们不必追究。然而正在这样一个十分严重的关键时刻，两派群众都瞪红了眼睛，恨不能喷出火焰焚毁对方。然而从天上降下来这样一个插曲来，群众先是惊愕，立刻转为哈哈大笑。这一场激烈无比的辩论还能继续下去吗？同样成串的破鞋，还出现在井冈山占领的学生宿舍的窗子外面。其用意完全相同。这些小小的插曲难道不能令人解颐吗？”（50—51页）

“我猛一抬头，瞥见一座楼的窗子外面挂满了成串的破鞋。……关于破鞋的故事，我上面已经谈过。老北大都知道破鞋象征着什么，它象征的就是那一位‘老佛爷’。我真觉得这些年轻的大孩子顽皮到可爱的程度。把这兵戎大事变成一幕小小的喜剧。”（113页）

以上文字，记述文革中北大互相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在辩论、武斗的过程中，各有各的“高招”；被压的一派井冈山兵团以悬挂破鞋来回敬新北大公社。那些场景我本人也曾亲眼目睹，回想起来历历在目。北大一派群众组织以“破鞋”来攻讦对方，那也是北大师生人人心知肚明的绰号。《牛棚杂忆》全书几十万字无一处提及“聂元梓”三个字，国学大师也没有“仍称她为‘破鞋’”。季羨林是以旁观者的视角对“破鞋事件”以及诸多文革情节进行描述，这与泼“脏水”不

是一回事。杜先生以“称破鞋”而指控的对象，应该是当年北大井冈山兵团师生群众；指控写《牛棚杂忆》的季羨林，对象搞错了。

我们研究文革史，作为文革的主要表现形式之大辩论与武斗，以及它们的行为特色，理应无一遗漏地记录下来，不管涉及哪一位公众人物，也不管谁喜欢还是不喜欢。犹如聂元梓拒不接受对她的判决，她有权利申诉。聂元梓反对是一回事，记载历史是另一回事。

至于“尽管她已服了十几年的刑，为她所作的坏事承担了后果”，这话也不对。对聂元梓的判刑属于罪刑法定，是另一个范畴的事情，这里不讨论。然而须知，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的后果是被用来引爆了十年动乱，这个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聂元梓本人承担不了，承担这一后果的是倒霉的七亿中国人民。至于聂元梓在北大文革中做的坏事，写一遍历史就应该重复一次，出一本书就应该涉及一回，历史必须得到尊重。

### 三、李雪峰说过“奉陪到底”吗？

杜先生在《李雪峰北大讲话的罗生门》一文中称：“李雪峰在回忆录中叙述内容很不可信，包括那个莫名其妙的‘奉陪到底’”“……李雪峰‘奉陪到底’的话相当不可信。”

作为1966年7月26日北大东操场辩论大会的亲历者，我亲耳听到李雪峰在讲话中说了“奉陪到底”这句话。

杜先生文中所说1966年7月26日北大东操场的群众大会，实际上举行了连续两个晚上，即7月25日晚7时许至10时许和7月26日7时许至10时许。那是一个由中央文革操控，所有北大教职员工蒙在鼓里，只有聂元梓一人得到江青面授机宜的辩论大会。辩论的主题是张承先工作组的大方向正确还是错误。中央文革的意图是通过施加影响，引导辩论作出“工作组镇压革命群众”、“工作组大方向错误”的结论。

两天的大辩论，充满变数与戏剧性，一个个意外的惊爆、一个个逆袭的桥段，令人瞠目结舌而又印象深刻。例如没有人通知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大会开始了，他还在打听开什么会、自己能不能参加；例如主席台上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刚要开口，江青上前左手摘掉陈伯达的帽子，右手拍着陈伯达的秃顶说：“看一看，这就是咱们的老夫子伯达同志。”例如天下雨了，工作人员给江青撑起一把雨伞，江青挥手将雨伞推开说：“我们没那么娇贵，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出去！”例如当江青说“阶级斗争斗到我们家里了……护士被坏分子赶走了”，坐在现场的毛泽东儿媳张少华抽身便逃，一伙人呼啸着起身追赶揪斗；例如康生每

每以浓重的山东口音宣读“这里有人递了个条子”，让人不寒而栗；例如康生突然高声断喝：“张承先站起来！”一个北大附中女生拎着皮带奋力抽打张承先，江青则给这个女生一个亲热的拥抱……

康生、陈伯达、江青宣布张承先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镇压群众，撤销工作组。他们以及朱德、王任重、王力相继讲话，尔后才点名李雪峰讲话。李雪峰穿着黄色府绸短袖衬衫，右手不停地摇动纸扇，左手时而张在耳旁扩大接听，时而搓揉面颊，表露出焦虑不安的心绪。看得出来，他对当场宣布撤销工作组思想准备不足，对奉命讲话也没有思想准备；所以只能一边琢磨一边讲，一边斟酌一边措辞。他有两句话令人印象深刻——“空军司令”和“奉陪到底”，这两句话以及江青的“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出去”、康生的“这里有人递了个条子”等后来被同学们用来相互调侃；江青摘陈伯达帽子的举动也被同学争相效仿。

从利害关系来看，否定工作组对李雪峰不利。面对突然而至的不利形势，李雪峰讲出“奉陪到底”这句话，我的直觉是他有难言之隐。

具体说，李雪峰所说“奉陪到底”的对象是当时台下的北大群众，他说工作组在你们那里，什么时候批判都行，随传随到，奉陪到底。

奉陪接受批判的主体是工作组，李雪峰显然难以与其撇清干系，所以不情愿地把自己若即若离地与“奉陪”联系起来。我感觉李雪峰的潜台词是：“既然结论工作组大方向错了，你们就批吧，想什么时候批就什么时候批，想批到何时何日就批到何时何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随叫随到奉陪到底。”

这个容易产生歧义的措辞“奉陪到底”，充分体现彼时彼境李雪峰惶惑无奈而又深藏不满，兼有几分牢骚的复杂心情。

---

## 【风云人物】

### 张春桥“家书”之外的另一面

李海文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载《炎黄春秋》2016年第一期，原题为《张春桥其人》，发表时有删节。这里发表的是作者提供的未删节稿。

读了《炎黄春秋》2015年第9期登的金大陆、金光耀先生写的《关于〈张春桥狱中家书〉的通信》，感到十分兴奋。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两位作者的观点，但是《通信》中有研究问题的理性和冷静，学术界终于能心平气和地讨论、深化文革研究了。对于金大陆先生写的《张春桥文革年谱长编》，我乐见其成。既然

是长编，就有作者的取舍，希望他不要像现在是有选择地编辑、出版《张春桥狱中家书》，而是准确、全面、客观地展现，让读者一睹张春桥的全貌。

今年是文革发动五十年，结束四十年。现在 40 岁以下的人都没有经历过文革，不了解文革是一场浩劫，当看到社会中的不公，有人误以为再来一次文革就可以解决问题，称赞张春桥以文革思想逻辑对时政的评说，甚至集会纪念张，为他招魂。不知者无罪，责任不在那些群众。

《张春桥狱中家书》出版后，有人被张对女儿、后代的爱而感动，改变了对张的看法，认为他有人性，充满了爱心。张春桥与正常人一样都会爱自己的妻子、子女。但是，他曾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等重要职务，曾主管中共意识形态工作，因此不能仅从对待家庭、爱人、子女的情感和态度上来认识与评价其人。

因此，如何认识张春桥，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一篇文章，不可能说尽张春桥的方方面面。本文只想选取与其家庭和经历相关的视角，来透视张春桥到底是一个高蹈理想的殉道者，还是一个充满心机的实用主义者；是一个充满爱心的谆谆长者，还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弄权政客。中国有一句古语“听其言，观其行”。让我们看看张春桥的所作所为再做判断吧。

## 张春桥包庇、篡改文静曾叛国投敌的历史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上海 1967 年 1 月、1968 年 4 月两次发生“炮打张春桥”的事件，其中一个原因是：张春桥的妻子文静是投降日本鬼子的变节分子。

文静生于 1916 年，原名李淑芳、笔名李若文，比张春桥大一岁。1933 年加入共青团，后失去组织关系。1942 年进入晋察冀边区，在党校学习后于 1943 年春分配至中共北岳区党委宣传部任干事。此时张春桥也在此任干事。两人相识、相恋。战争是残酷的，是年 12 月 8 日在日军扫荡中文静被俘，经不起酷刑，半年后投敌、叛变，编入日军“宣传班”，并任班长。她为敌人编写《我们不再受骗》《李老太太的悲哀》《弃暗投明》《玩火自焚》等文章和节目，鼓吹“中日亲善”，并亲自登台讲演、演出。她参加日军的“反共同盟”，与日军中西少尉一起秘密外出散发反共传单，策反劝降其他被俘的共产党干部。<sup>1</sup> 1945 年 6 月日本投降前夕，日本人都已是惶惶不可终日，李淑芳无处可藏，再次来到晋察冀投奔张春桥。此时张春桥任《晋察冀日报》的副总编。面对昔日的恋人、今天的叛徒，

---

<sup>1</sup>参见徐景贤：《十年一梦》第 390 页，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3 年出版。史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第 90—92 页，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2 年出版。

他没有一刀两断，而是收留了李淑芳，给她改名为文静。<sup>1</sup>因为李淑芳被俘、叛变在晋察冀不是秘密，很多干部都知道。但是，知道昔日的李淑芳就是今天的文静的人相对少一些。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9月初，张春桥随报社一起进入张家口，此时编辑部恢复部长制，张任部长，将文静安排在编辑部资料科任编辑。1945年12月15日他在填写《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组织部制履历表》时，对爱人文静加了一个小注：

已否结婚：未。 爱人姓名：文静 是否党员：是（注二）

他（她）过去负何职务：北岳区党委宣传部干事

现在何处负何职务：日报社资料科编辑

（注二）是1943年在北岳区党委认识的，但43年反扫荡中文静受伤被俘，直到今年始回边区。她的组织问题，据称已经天津市委解决，但未经正式转来，现正解决中（目前是个别关系）。

张有意回避文静何时、何地参加共产党，因为到党校学习的人并不都是党员。张更不写文静叛变的事实，含糊地写“她的组织问题”，“据称”“现正解决中（目前是个别关系）”。当时天津位于国统区，中共天津市委仍处于地下，与上级联系并不方便。何况共产党接管张家口后，千头万绪，干部审查力度有限。

到了1947年9月21日，张春桥填写《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组织部干部调查表》时，仍然写道：

爱人的家庭情况：文静本人则是学生，17岁开始参加C.Y（共青团的代称），中间失掉过关系。1942年来解放区，在分局党校学习，后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任干事。43年反扫荡被俘。45年6月逃出后，至今尚未恢复关系。

面对了解情况的同志，他只能如实写下：“至今尚未恢复关系。”<sup>2</sup>，但是，他还是没有写明文静是何时、何地参加共产党的。关于文静的历史问题，除“被俘”外，增加了“逃出”两字。逃出是越狱，还是其他？不得而知。

历史是无法改变的，文静的历史污点是张春桥的心病，在张的努力下，夫妻俩终于离开了晋察冀干部集中的华北，到了上海。1949年5月，刚到上海立足未稳的张春桥填写《华东局及上海市委干部履历表》时写道：

“文静（李若文）现在石家庄日报任编辑，是党员，曾被俘，尚未恢复关系。”

<sup>1</sup>徐景贤：《十年一梦》第390页。

<sup>2</sup>《家书》附录张的长女在访谈中说：她母亲是1945年做的结论：“变节”，见《家书》第288页。

张春桥在来上海之前任石家庄日报社长，安排文静任石家庄日报编辑并不难。他将文静的原名由“李淑芳”改为“李若文”，政治面貌已经明确为“是党员”。文静是何时、由哪个支部讨论入党？但是因离 1945 年时间不长，他还得承认“曾被俘，尚未恢复关系”。

几年以后，文静的历史问题在张春桥填写的各种表格当中已经消失了。1955 年 9 月 25 日，张春桥填写《经济状况登记表》时写道：

文静：新华社组长，行政级别 14 级，147 元。

共产党的原则是不准重用变节、叛徒分子。但在张春桥的保护下，文静不仅成为党员、组长，还破格成为 14 级干部。

一九五九年张春桥填写《干部履历表》时写道：

文静：党员，上海新华社记者。<sup>1</sup>

1950 年 6 月起，张春桥先后任新华通讯社华东分社社长、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上海市委文委代理书记、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60 年代初上海分社曾经向上海市委宣传部打报告提升文静为副社长，时任宣传部长杨西光将报告转到上海市委，但是没有被批准。<sup>2</sup>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曾经在晋察冀工作过，担任过石家庄的市长，是张春桥的老领导。张春桥的努力弄巧成拙，反而暴露了文静的历史问题，让上海市委、华东局更多的干部知道了。1959 年 1 月张春桥进入上海市委常委，不久将文静从新华社分社调到市委办公厅，既避免她出头露面，又让其通过做调研、编简报掌握全局情况。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张春桥一直将文静放在自己主管的系统，给她定的级别不低，并委以重任，爱护有加。文革中“抓叛徒”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文静坐卧不安。身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要常住北京，临走前对文静说：“你还（是）可以好好工作，有事可以写信给我。”给文静吃了一颗定心丸。

1967 年 1 月张春桥在上海发动“一月风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张春桥出任革委会主任。1971 年上海恢复中共市委，张春桥出任第一书记。一直到 1976 年 10 月 6 日粉碎“四人帮”，张在上海当了 10 年的第一把手，即便王洪文 1973 年在“十大”当了党中央副主席，在上海市委的排名张仍居王的前面。文静先后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材料组（后改为市革委会材料组、专案

---

<sup>1</sup> 张春桥填表格的内容均见史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第 93—94 页。《家书》附录张的长女在访谈中说：她母亲 1949 年重新入党。《家书》第 288 页。

<sup>2</sup>徐景贤：《十年一梦》第 391 页。



办）、市革委会办公室联络组（后改为调查研究组）工作，管过专案，抓过全市动态。她虽然没有名义上的职务，实际上却是这些组的负责人，享受着相当市委常委的政治待遇，发给她中共中央文件，市委、市革委会文件，市革委会各组、办公室、报社和各区、县、局的情况报告、简报等重要文件、材料。甚至有的不发给市革委会副主任的文件，由徐景贤提出，张春桥同意，也发给她。<sup>1</sup>文静在康平路市委大院大摇大摆，指手划脚，盛气凌人，俨然以上海的第一夫人自居，马天水、徐景贤有事都要同她商量，否则她就要兴师问罪。<sup>2</sup>

1969年4月“九大”结束，随即开展了整党运动，其中一项内容是把有确凿证据的叛徒、特务清除出党。文静惴惴不安。张春桥要她请假休息，不参加运动。<sup>3</sup>表面上，张春桥提出文静不再担任任何工作，称病在家。实际上秉承他的旨意，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照旧将文件由专人送到家里。文静仍然过问联络组的工作，经常把专案办公室的负责人找到家里出谋划策。王洪文在调中央之前，主持上海市委工作时期，也常常到文静家里去，商量工作。黄涛、朱永嘉、何秀文等人为了讨好张春桥，常常把自己起草、经张春桥批示的发言稿送给文静，请她“审阅”、“指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6年10月14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北京回来将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打招呼会议精神转达后，才停发文静的文件。

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张春桥成为林彪集团成员的主要攻击对象。虽然因毛泽东的表态，张春桥得以过关，但他知道今后还有风险。9月28日，他给文静写信说了些一语双关的话：

“如果发生问题，一切从简，不要惊动什么人。弟弟们可以通知一声，但是，要他们不要到上海来，此事，应由佩英（注：张的妹妹）通知。”<sup>4</sup>

“九一三”事件林彪集团垮台。1972年底，张回上海，在兴国饭店和文静生活在一起，安排好今后的生活、工作。

1973年8月，在“十大”张春桥进入中央常委。一向对张春桥有高度警惕的周恩来再次出手。在“九大”前后，周恩来曾三次写报告要审查张春桥的历史问题。<sup>5</sup>这在当时是唯一能打击或停止张工作的正当理由。但是周的报告石沉大海。所以张春桥敢明白地告诉文静：“也不会为这个问题（文静的历史问题）打倒我。”<sup>6</sup>

---

<sup>1</sup>史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第94—95页。

<sup>2</sup>参见徐景贤：《十年一梦》第392页。

<sup>3</sup>史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第96页。

<sup>4</sup>史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第94—97页。

<sup>5</sup>《光环与阴影——黄春光口述史》，收入米鹤都：《回忆与反思口述历史丛书之四》第45页，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年出版。

<sup>6</sup>史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第96页。

此次周恩来没有再写报告，另辟蹊径。9月周恩来陪法国总统访问上海，邓颖超同行。晚间，邓颖超到康平路市领导的各家串门，但是，唯独不进文静的家门。邓颖超这个举动，吓得文静心脏病发作，住进医院。周恩来、邓颖超用“礼节拜访”方式点了张春桥的死穴。

消息迅速传到北京，张春桥决定与文静离婚。他托王洪文陪外宾到上海的机会，向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转告他离婚的决定。在上海，马、徐、王是仅次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之后的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王洪文说：“文静仍旧住在康平路，这里是她和孩子的家，这样对孩子们更好。这个消息不必对外宣布。要考虑到影响。”<sup>1</sup>

从此张春桥再也没有回过上海，有家不能回。文静也从未到过北京。但是，孩子们可以自由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张春桥通过孩子们和文静保持来往。1976年10月当王秀珍电话找不到张春桥时，10月8日一大早向文静打听消息。<sup>2</sup>可见文革期间上海领导班子相信，名义上与张春桥离婚的文静最应该知道张的动向。

文静不搬出康平路，明上说是给孩子们好。其实，张春桥是怕文静搬出去，落到别人手中对他不利。1969年2月，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去世。正值张春桥挥舞阶级斗争的大棒“打倒一切”的高峰时，姚蓬子既是叛徒、又当过国民党特务，如何处置姚文元的母亲是个难题。张春桥亲自找姚文元的妻子金英谈话，说：“还是把母亲接来，住在一起好，免得住在外边，被人家揪住更不好。”<sup>3</sup>张春桥对文静的爱护，姚文元当然心知肚明。1975年6月，姚文元回上海，王秀珍又问起“离婚”这件事，姚说：“文静的历史不成问题了。”同年8、9月间，王洪文在中央受到批评回到上海，还单独宴请文静。<sup>4</sup>

1976年5月将“天安门事件”镇压下去后，张春桥给徐景贤写信，要徐为他在上海找个“伴”。经过寻找、物色，10月6日徐景贤将这位女士的资料发到北京。人算不如天算，这天晚上张春桥被隔离审查。<sup>5</sup>

文静深知自己与张春桥的命运连在一起。10月13日，当“四人帮”被隔离的消息得到证实后，文静要女儿打电话把张春桥在上海的亲信萧木、朱永嘉找去，气急败坏地质问：“难道就这样完了吗？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朱说：“常委说要等去北京开会的几个书记回来后再定，没有办法。”文静直接鼓动他们叛乱：“他们不搞你们可以搞嘛。可以组织写作组的一些人到下面去，搞串连、发动。

---

<sup>1</sup>徐景贤：《十年一梦》第397页。

<sup>2</sup> 1976年11月6日王秀珍在上海区县局干部大会上的检查。

<sup>3</sup>史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第96页。

<sup>4</sup>史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第97页。

<sup>5</sup>徐景贤：《十年一梦》第402—409页。

我不相信群众起不来。”还说：“你们不要太消极，可以到工人中去，潘国平还在组织队伍。”<sup>1</sup>

## 张春桥隐瞒历史，编造资历

前面讲了“九大”前后，周恩来曾三次写报告要求审查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最近有人知道此事后，问：“张春桥是叛徒吗？”

文革结束后，经过审查，1980年大家知道张春桥没有被俘过，本人不是叛徒。

周恩来的三次报告只有像黄永胜这样的政治局委员才能看到。那么，文革中，关于张是叛徒的传言为何广为流传呢？

包庇文静的行动，使人们怀疑张春桥的历史是否清白。人们从中央文件找到另一个线索。1971年12月11日，中央发出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附件中，包括供批判的《“571工程”纪要》。在《纪要》中明白地写道：“一定要把张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虽然在文件该页有个简单的脚注：“这是林彪一伙对张春桥同志的造谣污蔑和陷害。”但是没有明确说明张春桥从未被俘、被捕，不是叛徒。当时中央就有人提出不要印发《纪要》，遭到毛泽东的拒绝。<sup>2</sup>毛泽东为何这样坚持，是不是想起周恩来的那三个报告，还是有其他考虑……

张春桥不是叛徒，是不是假党员？张春桥1938年8月，由顾光斗、雄飞介绍，在陕北公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预备党员，候补期半年，于1939年2月转正。<sup>3</sup>入党手续是齐备的，他不是假党员。

然而群众在调查中发现了张春桥入党过程中的问题。1967年5月，上海市化工“七·二一”大学的政工干部和政治教师陈美痕、徐嘉然、陈效宗、严中、熊自强等6名共产党员，在外调“七·二一”大学党委书记时发现张春桥参加过“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委员会”，这是个冒充共产党的组织。宋振鼎（化名吴成志）与林福生（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4、5月间成立。宋振鼎亲自介绍张春桥参加。后上海党组织派吴仲超找宋谈话，指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立即解散。也就是不承认这个组织任何成员的党籍，当然也包括吴仲超没有见过的张春桥。<sup>4</sup>

这个组织是哪年成立的？张春桥说是1936年。1950年10月填写《华东军政委人事局制职员简历表》时写道：

<sup>1</sup>史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第100页。

<sup>2</sup>史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第65—66页。

<sup>3</sup>史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第64页。

<sup>4</sup>史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第69页。

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入党，候补及转党年月：

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经吴成志、林福生介绍入党。

一九三八年八月在延安经顾光斗、雄飞介绍重新入党。39（年）二月转正。

1955年审干时，宋说此组织是1937年4、5月间成立。组织又去找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吴仲超。吴仲超回忆：“我于1936年2月出狱到上海，不久和宋振鼎同志（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厅长）认识，当时都在找党的关系，我到1936年下半年经张执一才与党取得联系……。”<sup>1</sup>

张春桥看到吴仲超的证明又改口承认是1937年的4、5月间。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开始全民抗战。中国共产党规定7月7日之前参加的是内战干部，之后的是抗战时期干部。张春桥也就不必为这一年之差的时间那么较真了。但是他没有如实向组织交代他参加的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党组织。

1937年张春桥只有20岁，为了追求进步误入一个假的共产党组织，并不是多么严重的问题。1934年夏，上海地下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不少党员与组织失去联系。1937年为共同抗日，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当时党组织对从监狱里出来的人进行审查，根据各人情况或者分配工作，或者送延安学习、休养，而后分配工作。对叛徒一律不接关系，这些人回家后，有的不甘心，有人假借共产党的名义成立各种名目的组织，发展追求进步的年青人。但是他们要与真正的共产党建立关系，才能使之合法。党组织审查时，不准叛徒回到组织，但是认可青年人追求进步、要求加入共产党的意愿。对这些人，逐个审查，根据本人历史情况和表现，决定去留。当时共产党处于地下，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很多到延安的老共产党员因一时难以找到证明人，就重新入党。等到环境安定、条件允许，由组织审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承认以前的党籍。关键是组织一直不承认张春桥是内战干部，建国后审干时，认定张是1938年8月加入共产党。对此张春桥一直耿耿于怀。

早在1938年1月，张春桥从济南到延安进陕北公学学习，就四处奔走，找人证明自己的党员身份，曾找原来在上海工作过的同志，找到原上海党组织的负责人，时任陕北公学专职教师周扬。然而，他们因在上海不认识张春桥而无法作证。所以张春桥一开始未能解决组织问题。同自己一起来陕北的二弟秋桥，当年3月入了党，奔赴山东抗日前线。压力之下，张春桥放弃了“追溯”党员身份的诉求，于1938年8月入党。建国后张春桥仍然隐瞒实情，坚称自己是内战时期的干部，把入党时间填写为1937年4、5月间。他一方面主张批判资产阶级法权，

---

<sup>1</sup>史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第68—71页。

一方面为延伸自己的革命资历颇费心思。虽满足了一时的虚荣心，为升迁争取资本。但此举又应了那句老话“聪明反被聪明误”，入党时间问题和文静的叛变问题成为他政治生命中的隐患。文革中的张春桥，一面公开大抓叛徒；一面处心积虑地隐瞒、回避自己的历史问题；同时不遗余力地打击、迫害揭发他的群众。

张春桥耍小聪明，到古稀之年仍然如故。晚年给女儿写信，仍然要在自己的资历上添油加醋。在1992年12月29日的信中，他回忆了与毛主席第一次谈话，说：“1939年初，我在陕北公学当宣传科长，他到学校做报告，事先向我调查学生的思想情况。谈了些什么，一点也不记得。当时他写了一些字，这张题词，我带到敌后，在一次扫荡中被日本人抢走了。”<sup>1</sup>

1939年2月才转正的新党员张春桥有可能担任陕北公学的宣传科长吗？那时共产党的机构精干，层次少，科长就是中层领导或重要干部。

当时陕北公学的校长是成仿吾，1928年入党，从德文直译《共产党宣言》，1934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委员，是党内有名的翻译家、理论家。副校长、党委书记是李维汉，1922年入党，1925年在中共“四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0年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李维汉回忆：陕北公学于1937年9月1日开始上课，到10月学员已经有五个队，共约六百人。学员不仅有小学生、也有像张春桥这样的初中毕业生，还有大学生、留学生。学期一般是3个月。11月1日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学校设教务处、生活指导委员会（相当政治部）、总支委。学员分为队、分队、班。队相当于连，是教育单位，又是自治单位，每队约一百到一百二十人，由队长、指导员、助理员、副队长、队学生分会主任等组成队的领导小组，负责全队的工作。班是学习单位，每班有8—10人，文化水平有高有低，搭配编班。班长、副班长由学员选举产生。<sup>2</sup>当时的队长、指导员都是由长征干部或内战时期的干部担任，副队长以下的干部由学员选举。

张春桥只是一般学员，留校也只是干事而已。

查阅李维汉的回忆录《回忆与研究》一书，1938年4月中央决定柞水县看花宫成立陕北公学分校，由李维汉任分校校长，率大部学员于5月30日离开延安迁到陕西柞水县看花宫。成仿吾留总校主持工作。政治部宣传科长是申光。<sup>3</sup>

李维汉回忆是从1979年开始，由他口述史实，并提供调查线索，然后由协助整理的同志根据他的谈话的基本内容和搜集到的有关资料，和向知情人采访的内容，整理成文，再由李维汉亲自审阅，反复修改。1986年1月出版。帮助整理抗日战争时期的有王淇、吴良珂、宋金寿等8人。王淇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共

---

<sup>1</sup> 《张春桥狱中家书》第125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

<sup>2</sup>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97、403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出版。

<sup>3</sup>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414页。

共产党的，人民大学党史系的老师，后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室委，现年 90 岁。陕北公学办了不到 4 年时间，培养了一万一千多名学员。<sup>1</sup>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陕公学习过的学员大都是六、七十岁，活跃在全国各地、各行业。所以李维汉回忆申光是宣传科长，不仅是他个人回忆的孤证，也是王淇等同志调查的结果。

文革前张春桥在干部履历表中填的是：校刊编委会宣传部长<sup>2</sup>。这是一个群众自治组织职务，不是行政职务。1939 年 12 月，张春桥担任的是华北联合大学宣传科长。<sup>3</sup>这年 7 月陕公和鲁艺、安吴堡青训班、延安工人学校合并为华北联合大学，离开陕北到了敌后晋察冀边区。

毛泽东很关心陕北公学的工作，多次到学校做报告，并题词。张春桥在延安时也听过毛泽东的报告。他和毛泽东根本没有单独交谈的机会，更不会得到题词。所以他在信中说“谈了些什麼，一点也不记得”。至于那张题词，他说：“我带到敌后，在一次扫荡中被日本人抢走了。”

他可以瞒过没有研究这段历史的女儿，但是他瞒不了历史工作者。

张春桥为了提高、维护自己在女儿心中的形象，不惜编造历史。这种行为是真爱吗？

### 张春桥残酷打击了解、揭发、反对他的人

按照共产党的审干标准，文静有严重的历史问题。张春桥的入党时间有疑点，但并不是假党员。文革是一个斗争哲学大行其道的年代，这些都成了张春桥格外忌讳的政治软肋。为了保护这软肋，张春桥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1967 年，为了抓叛徒，上海市革委会材料组组织干部、红卫兵清查敌伪报刊、资料，有位同志接触到了张春桥三十年代攻击鲁迅的文章，1970 年 2 月他被拘留审查，关押了 5 年 3 个月之久，直到 1974 年 4 月才释放。<sup>4</sup>

1968 年 4 月，上海第二次“炮打张春桥”，4 月 12 日，市革委会组织组有两个人看了文静的档案，同时说了几句怀疑张春桥历史的话。张春桥大为恼火，在他的指使下，由徐景贤到组织组取走了文静的全部档案，密封在市革委会档案室。同时，王洪文派金祖敏彻底改组了市革委组织组，把那两个人调离，设专案折磨八年之久。<sup>5</sup>

1967 年 1 月，上海师院近两千人举行反对张春桥的示威游行，然后调查张春桥、姚蓬子的历史，整理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过去写的文章。张春桥把一

<sup>1</sup>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 422 页。

<sup>2</sup>史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第 73 页。

<sup>3</sup>史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第 75 页。

<sup>4</sup>李海文、王守家：《“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第 221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 年出版。

<sup>5</sup>史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第 95 页。

个红卫兵组织的大多数负责人打成反革命分子。1967年9月4日，对2500名师生搜查、抄家，不仅翻箱倒柜，还捅破天花板，掘地3尺，折腾了13个小时。同时派记者现场采访，派专人验收，结果一无所获。张春桥大失所望，训斥“对政治材料不够重视”，要好好“吸取这个教训”。他很快领悟到材料都在这些人的头脑中，要毁掉这批材料，必须整垮、整死这批人。1970年11月，张春桥以研究政史系大批判为名召开座谈会，在会上大骂反对他的人是“豺狼虎豹”，要对他们“用锥子”，“动刀子”。并宣称“中央已经把杀人权交给我们了”，“什么红卫兵小将犯错误，这次该杀的就要杀”。

在他的指使下，制造了“三分钟抓一个反革命”的样板，将大批群众干部抓起来，两幢教工宿舍改为监狱一样的隔离室。重点人员关进潮湿阴暗的地下室，睡在水泥地上，有了病不准治疗。大搞逼供信，在小小隔离室装上高音喇叭，半夜三更突然播放逼供书，播放这些被关人员亲属的泣不成声的讲话录音，将人逼疯、跳楼，身亡后还要扣上“畏罪自杀”的帽子。<sup>1</sup>

上海市化工“七二一”大学陈美痕、徐嘉然、陈效宗、严中、熊自强、王奇峰等6名共产党员，1967年5月在外调时发现张春桥于1936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委员会”。他们认为像张春桥这样的人在中央文革工作会对党造成巨大的危害，7月里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分别上报党中央、中央文革和上海市革委会。在附件中列出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员名单，其中就有张春桥。于是他们被扣上“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窃取国家机密”等罪名。1967年底张春桥批示：“怎么坏人揪坏人？”于是他们成为“坏人”。清队、整党、“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整风……每次运动都要把他们大整一通，一次比一次厉害，持续8年之久。

1967年8月，六人的调查被勒令停止。大家商量由陈效宗绕道家乡山东去北京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张春桥的历史问题。不料他在公平路码头上即遭绑架。一群人手持各种凶器，将麻袋套在他的头，往汽车里一扔。陈效宗爱人抓住汽车不放，他们就猛力踢开她的双手。陈效宗爱人和孩子边哭边追汽车。他们将陈效宗拉到私设的审讯室，用垒球棒打他的头，用橡皮包着钢丝的鞭子抽打，用铁勾子勾他的手，将皮肉翻出来。甚至将他8岁的女儿拉来。当时陈效宗眼睛蒙着，只听见孩子哭、叫喊，当他想去用手摸时，孩子在哭喊声中已被带走。并不断播放充满鞭打、惨叫的录音，严刑拷打了十天十夜。陈效宗遍体鳞伤，发着高烧，腰子被打坏。1971年将他关在四面密封的大木笼里，后来关在不到3平方米的暗角里，头抬不起来，吃、喝、拉全在这个阴暗、潮湿的小间里，被子湿得可以

---

<sup>1</sup>1977年5月11日在上海全市揭批大会上上海师院党委代表的发言。见李海文、王守家：《“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第301—302页。

拧出水来。马桶成了他吃饭、写材料的地方。还把他捆在椅子上，吃饭也不放开。陈效宗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仍然把他关到监狱。

徐嘉然是和陈效宗一起到内蒙古调查的，并起草了调查报告。他被反复刑讯逼供，被打伤了不准去医院看病。伤势太重不得不送医院，又要写明是“反革命”。最后为了销毁罪证，还烧毁了他的化验单、病历。在一次千人大会上，徐嘉然高呼“革命无罪”，马上被打得皮开肉绽，满身是血，拖到地下室，两天两夜不给吃一口饭，喝一滴水。

陈美痕将要临产，也被拉到台上批斗。孩子出生后还没有断奶，就被关进封闭式的学习班，不准回家，不准见孩子。两年后回家，孩子完全不认识她，呆呆地望着她。

严中在战争年代有多种疾病，身体虚弱，仍被绑架、毒打，大口吐血。癌症手术后，因是“反革命”，被阻止治疗。

王奇峰被折磨成癌症。

熊自强不仅自己受到长达8年的迫害，刚进小学的儿子也被看成“小反革命”。

6个人受打击迫害的直系家属就有30人。陈美痕的父亲被隔离两次长达4年之久，爱人被审查两年。龚书葵老师曾拿出300元支持他们外调，他的头被套上麻袋毒打，还把他的头按在小便池里，逼他喝尿。6个人有3个被先后隔离、拘留2到4年，还有3个人分别关到有人监护的小屋子里，4个被抄家，被批斗几百次。手段极其残酷，名目繁多，如“疲劳轰炸”、“车轮战术”，从早到晚揪到各个班组游斗，有时一天十几场，不让休息，还有喷气式、挂大牌、低头弯腰，拳打脚踢，半夜突击审讯，甚至记录他们所说的梦话。采用“没有材料也要整出材料来”的手法，大搞逼供、套供、诱供，无中生有，捏造事实，强加罪名。审讯时，办案人员有人问：张春桥到底参加过这个组织吗？马上有人说：别问了，再问下去，连你们自己也要倒霉的。<sup>1</sup>

文革初期，公安局为了清查叛徒、特务、反革命，曾成立一个30年代文艺黑线专案组。张春桥怕查到自己头上，下令把这个专案组的办案人员和材料全部并入市革委会专案组，由他和王少庸控制。半年后以“旧公安人员不可靠”，全部赶出专案组。一个人曾接待过交通部外调人员，按规定为他们转了一封介绍信。因外调接触到江青1934年被捕情况。王少庸下令将材料追回，将交通部的两名外调人员及这位公安和与他一起工作的两位公安统统抓起来，打成“五一六分子”。

---

<sup>1</sup> 中共中央下发的10号文件《王、张、江、姚反党罪证（材料之二）》：1977年5月11日陈美痕在上海全市揭批大会的发言。见李海文、王守家：《“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第294—296页。



解放初期，公安局接管了一批敌伪档案和 30 年代的报刊。江青说公安局有她的“特别档案”。张春桥立即指使当时负责公检法的空四军第一政委王维国，集中 1000 人，到公安局翻箱倒柜“清理档案”，拿走涉及江青的资料 50 余册，查封 30 年代的书刊 15000 册，拿走张春桥、姚文元父亲姚蓬子的材料一大批。张春桥做贼心虚说：“看档案要有控制”，“敌伪档案不一定可靠”，“登报的不一定是叛徒”。张春桥以“防扩散”为名，下令凡涉及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一不准外传，二不准扩散，三不准登记，四不准办签发手续。以“收集无产阶级司令部材料”的罪名，将档案处两名处长、两名干部押送到北京长期关押，将处长王学纯折磨得下肢瘫痪，有病不让治。在场的医护人员看不下去，提出抗议。他们竟然将人抬出病房，把她拖进冰冷的房间，连续数小时逼供。将王学纯迫害致死。

张春桥直接指使王维国捏造了 17 件所谓“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侦察控制”的假案，把原上海市委两位书记和 97 名公安干警打成反革命。一个处 250 多人，有 137 人被扣上“侦察控制无产阶级司令部”被关押，51 人打成反革命。1969 年初，张春桥说公安干警“反动、顽固、狡猾”，对他们就是“要突出一个狠字”。办案人员鼓吹“打人是觉悟高的表现”，“假的要当真的打”，“要像摘葡萄那样一串一串摘”。在公安系统大搞白色恐怖，刑讯逼供，大搞“疲劳战”、“车轮战”、“火线学习班”、“大兵团作战”、“夜开花”、“开刀间”，用冷水浇，热水烫，反绑吊打，直到木棍打断，铜条打弯，还有“跪凳角”、“耍猴子”、“火烧胡子眉毛”、“抽筋”、“剥皮”、“坐地老虎凳”、“假枪毙”等三、四十种法西斯式的刑罚。市公安局院内拷打声、惨叫声不断，周围居民听不下去，向市革委会反映，市革委会却置若罔闻，不予理睬。把一大批干警打成“反革命”后，押送劳改农场，利用劳改犯整他们。他们的子女也不能幸免，被打成“小反革命”，受尽歧视。

“四人帮”为了掩盖自己的反革命历史，有计划、有组织地残酷镇压公安干警。从市公安局到区、县公安机关直至派出所，从各级领导到一般干部、民警直至公勤人员，从从事几十年公安工作的老人到刚进公安机关才几天的新人，都有受到无辜迫害的。全市公安系统受到迫害的干警达 3000 人，被整死和被自杀的有 113 名，还有一批被折磨得精神失常或成为残疾。

我在写《“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一书、将上面的文字一一敲进电脑时，不禁头皮发紧，牙根都痛，毛骨悚然。张春桥心肠之歹毒，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张春桥仅是上海的第一把手，就敢如此无法无天，如果取得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将中国引向何方，真是不寒而栗。

### 张春桥是上海打砸抢和暴力镇压的总后台

张春桥的家书会让人误认为他仅是舞文弄墨的文人，热衷于思想理论，其实，他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充满了暴力和血腥。

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市委在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的领导下经过查证核实，逮捕和拘留了打砸抢分子458人，其中担任党政工团各级领导的125名；当过所谓“造反队”“司令”、“队长”、“头头”的78名；充当专案组、工宣队骨干等犯有打砸抢罪行的226名。

在已拘捕的打砸抢分子458人中有：(1)直接打死人的凶手57名，逼死人的首犯52名；(2)为首或参与策划、指挥全市闻名的“康平路事件”、“昆山事件”、上柴、青浦、101厂以及铁路南站等武斗事件中的打砸抢分子和首犯，如“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工总司”北上返沪第二兵团“司令”耿金章，“文攻武卫”的头头张宝林、“铁路联指”头头谢鹏飞，青浦“小五虎将”陈恩伯，普陀区联络站头头沈国铨等人；(3)非法组织“治安组”大搞打砸抢的为首分子，如“上体司”“司令”胡永年、“治安组”头头楼骏等人；(4)残酷毒打迫害领导干部、著名教授、演员和文艺、科技、医务人员的主谋者、策划者，如迫害原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的所谓“学生领袖”刘浩德，和迫害原交大党委副书记张华、邓旭初的所谓“学生领袖”严步东，迫害黄浦区副区长张六吉致死和迫害杨士法的原市革委会专案组成员申明全和中华造船厂专案组长盛松章、王耀商，参与迫害化工学院党委代理书记田辛致死的唐文熙，迫害文艺系统著名演员的造反派头头陈光文等人；(5)制造冤假错案、残酷毒打迫害大批干部、群众的主谋者、策划者，如制造江南造船厂地下党大冤案的江南厂工宣团政委黄星和制造杨浦区纺织系统地下党大冤案的国棉十二厂造反派头头、厂革委会副主任王新林等人。<sup>1</sup>到1979年这458人中已判刑的有238名。事实俱在，铁案如山。事情已经过去了近40年，没有一个人翻案。

限于篇幅，仅以胡永年为例，剖析张春桥如何重用、包庇打砸抢分子。

文革初期，上海足球队队员胡永年造反，大搞打砸抢，被张春桥看中。1967年1月，全市掀起第一次“炮打张春桥”的高潮，张春桥指使胡永年四处镇压。胡永年调动人马，把在南京路刷反对张春桥大字报的红卫兵强行拖入体委大楼，进行围攻、辱骂，并拍下照片，用武力威胁他们将大字报撕下来。张春桥吹捧胡永年为：“我们的胡司令！”“我们的大炮！”1967年6月，市体委革委会成立时，张春桥亲自将原上报担任革委会主任的人拿掉，让胡永年担任上海体育革委会的主任，后来张春桥点名让胡担任市革委会委员、市文教组核心成员，市保卫组副组长，还亲自委托他抓上海的“社会治安”，甚至将胡评为全市先进个人。1968

---

<sup>1</sup> 1980年6月3日《情况汇报》第81期。

年4月第二次“炮打张春桥”时，胡永年投桃报李，立即到体委的基层单位拍着胸脯叫喊：“张春桥我就是要死保，保定了。”他带人看地形，策划武斗方案。

1967年、1968年，胡永年在张春桥的指使下，在社会上到处插手，挑动武斗，大搞打砸抢。他把工人群众成批地捉进体委大楼，强迫他们脱去鞋袜，跪在地上，或绑在长凳、乒乓台上，胡永年带头用鞭子抽，木棍、铁棒毒打，用大刀的刀背砍劈，甚至用狼狗咬，将人打死，手段之残酷、毒辣如同国民党特务机关。1968年1月胡永年召开体委系统大会，在会上，他说“气氛不够”，带头毒打干部，许多没有任何问题的干部，有的被打得鼻青眼肿，有的被打得口腔破裂，牙齿掉了好几颗，有的当场大腿被打断，有的被打倒后，还跳上背部继续用脚踩，被打伤的人还不准看病，有的回家不久就死了。之后，体委系统打人之风更加肆无忌惮地刮起来了。他经常说这个单位的当权派不老实，要“清醒清醒”。胡永年召开现场会，他督战、动手对一名干部审讯，一边打耳光，一边要他回答问题，让他举起两手，稍微垂下来，胡永年就用烟头烫，用大头针扎。从傍晚到第二天早上，整整折磨了十几个小时。在他的现场示范后，体委系统的逼供信更加猖獗。

1969年春节，体委系统有人揭露、批判胡永年的罪恶行径，张春桥、王洪文立即通过马、徐、王派人将这场斗争压下去。后来在“一打三反”中群众再次揭露胡永年的罪行，王秀珍却说：“上海的几个司令，胡永年还是比较好的，不要搞了吧！”再次包庇下来。

1974年毛泽东指示解放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并分配工作。张春桥极力阻止，同时张下令要给一批因表现不好而被群众反下去的老造反派“落实政策”。马、徐、王按照张春桥旨意让胡永年当体委副主任，重新提上来。

张春桥授意要把胡永年拉入党内，对他的严重问题，采取“不要内查外调，不要接触本人，从现有材料中找出结论”的办法。这件事由于遭到体委系统广大党员的强烈反对，未能得逞。1975年徐景贤找胡永年密谈，当面给党票，说“祝你早日入党”。王秀珍向胡交底：“你们这些的组织问题，要通过在中央工作的上海领导，你们可不要着急呀。”

胡永年这类流氓阿飞、打砸抢分子就是张春桥的依靠对象。张春桥利用胡永年当打手，胡永年死心塌地为张春桥卖命。张春桥担任上海10年的第一把手，他是上海打砸抢、镇压革命人民的后台。

以上所举，不过是张春桥在台上期间的几个侧面而已。就这也足以让我们看到他的人格并非表里如一，施政更无人性可言。后人读书，切不要被他的书信集中营造的家庭温情、“革命理念”而一叶障目，忽视张春桥真实、丑陋、残酷、血腥的一面。

2015 年 10 月 17 日第一稿

2016 年 1 月 8 日第四稿

---

【书海泛舟】

## 《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 南外红卫兵打死工人王金事件个案分析》简介

乔晞华

《昨天》编者按：乔晞华著《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南外红卫兵打死工人王金事件个案分析》，已于 2015 年 12 月由（台湾）博客思出版社出版。作者为旅美华人学者。1989 年赴美留学，1992 年获社会学硕士学位，1996 年获社会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某州司法部研究人员。

拙作分三个部分：一、王金事件始末；二、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三、文革暴力、真相与和解。

### 第一章摘要：

1966 年 9 月 29 日，南京玄武建筑联社三队工人王金因多捡了两张传单，被南京外国语学校 31 位红卫兵打死了。王金之死引发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慑于民愤当局不得不逮捕了三名红卫兵。南京“9·28 联合调查团”在时间上和自发性上超过了公认的全国第一个工人造反组织上海“工总司”。调查团不仅弄清了王金之死的真相，而且扼制了南京的红卫兵暴力。王金事件是典型的贵族红卫兵打死人事件，与北师大女附中的卞仲耘案极为相似。本章揭露的真相对于研究其他贵族红卫兵打人事件不无参考价值。南外校友的传言、回忆与调查团揭露的真相之间的差异值得关注，其可靠性值得研究。

### 第二章摘要：

社会运动学（social movements）与文革研究密切相关。该领域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异军突起有了“爆炸式”的发展，但是未引起华人学界的重视。“一个文革说”与“两个文革说”的争论持续了 30 多年，至今仍悬而未决。本章从社会运动学的角度对两个学说分别进行了批判，前者信奉英雄创造历史，认为民众无知、非理性，从而否认造反运动的独立性，后者担心造反派被妖化过分强调其独立性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孤立性。更重要的是，支撑两个学说的理论均存在问题。前者基于早已被理论界摒弃的乌合之众论，后者基于的社会冲突论淡出研究领域也达数十年。本文提出“博弈说”，旨在终结长期的争论，为文革研究提

出新的方向。

### 第三章摘要：

文革暴力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原因和文化原因。目前的研究仍无法完全解释文革的暴力。犯罪学从社会的角度解释犯罪问题，为我们研究文革暴力提供了新的思路。斯坦福监狱实验显示恶劣的系统与环境所产生的潜在毒害，能够让好人做出有违本性的病态行为。人一半是天使，另一半是魔鬼。文革的大环境使中国人的另一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近 30 年来出现的“真相与和解”的模式值得我们借鉴。该模式发掘事实真相，找出受害者和施害者，给予有限的、有条件的赦免。本章提出，放弃追究责任、放弃谴责，目的是为了使真相浮现。没有赦免，当年的施害者不会愿意出来坦承事实的真相。我们应该对事不对人，以“南外模式”探寻匿名的真相。

### 绪言

这是一所公认的全国最好的中学之一。

这是一所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建立的学校。

这是一所走出过数百位外交官的学校。

这是一所培养出数位为国家领导人作翻译的学校。

这是一所毕业生常被国外大学以全额奖学金直接录取的学校。

这是一所拥有无数校友是博士、教授和学者的学校。

然而在这些鲜艳夺目的光环下，这所学校有着最黑暗的一页。1966 年 9 月 29 日，这所学校的 31 位红卫兵无故打死了一位工人。这就是当时震惊南京市甚至江苏省的闻名的南京外国语学校红卫兵打死工人王金事件。本书试图重新打开这一长期封存的悲惨之页，以警示后人。

本书为纪念文革发动 50 周年而作，为纪念在文革初期被贵族红卫兵打死的王金先生遇难 50 周年而作。

### 目录：

#### 第 1 章 王金事件始末

##### 1.1 王金事件真相的不同版本

##### 1.2 王金事件的责任人

##### 1.3 工人、学生联合调查团的成立

##### 1.4 社会对王金事件的不同反应

##### 1.5 调查团初战告捷

##### 1.6 王金事件调查报告：前言

- 1.7 王金事件调查报告：王金是怎么死的？
- 1.8 王金事件调查报告：省市委是如何保护凶手的？
- 1.9 王金事件调查报告：两份不同的法医鉴定书
- 1.10 王金事件调查报告：王金的简介
- 1.11 调查报告与南京外国语学校校友传闻之间的差异
- 1.12 缉拿凶手
- 1.13 王金事件调查报告：参与王金事件的学生名单
- 1.14 凶手们后来的命运
- 1.15 调查团工人成员后来的命运

## 第 1 章附录

- 附录 1.1 南京市玄武区建筑公司第三工程队的揭发材料
- 附录 1.2 南京外国语学校部分师生揭发材料
- 附录 1.3 部分市委区委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
- 附录 1.4 国营 X 厂 1130 名革命职工的来信
- 附录 1.5 南京市委的检讨
- 附录 1.6 王金事件记事
- 附录 1.7 市委常委、书记碰头、办公、处理会议记录
- 附录 1.8 审问王金记录
- 附录 1.9 王金事件揭发批判大会
- 附录 1.10 刑事摄影（南京市公安局五处）

## 第 2 章 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

- 2.1 文革研究界的确定
- 2.2 群体行为的分类和理论
- 2.3 社会运动的分类和理论
- 2.4 文革与文化、革命、社会运动的关系
- 2.5 定量、定性研究法的区别
- 2.6 运动定量分析的指标
- 2.7 统计学中的聚类分析法和隐类别分析法
- 2.8 建国以来运动的分类分析
- 2.9 建国以来政策的分期
- 2.10 运动分类和建国以来年代分期的意义
- 2.11 “一个文革说”的缺陷
- 2.12 “两个文革说”的缺陷
- 2.13 文革的分期：2 年、3 年、10 年？

2.14 文革的定义：内乱、运动、游戏、博弈？

第2章附录

附录2.1 建国以来的运动及运动分类指标

附录2.2 聚类分析模型

附录2.3 隐类别分析模型

附录2.4 建国以来政策分期统计分析

第3章 文革的暴力、真相与和解

3.1 王金事件和卞仲耘案的异同

3.2 历史故事化和故事历史化

3.3 文革暴力的研究综述

3.4 人为什么会犯罪

3.5 三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

3.6 是天使还是魔鬼？

3.7 真相、和解与宽恕

结束语

---

【书海泛舟】

## 南京王金事件始末

（《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

南外红卫兵打死工人王金事件个案分析》选读）

乔晞华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乔晞华著《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南外红卫兵打死工人王金事件个案分析》一书第一章。

### 第1章 王金事件始末

1963年周恩来亲自批准在全国建立首批外国语学校，南京外国语学校是其中之一。刚开办时，南京外国语学校分别从二年级学生、小学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中招生。自1982年起改为只从小学毕业生中招生。初建时学校设有英、德、法三个语种，1982年起增设了日语专业。

南京外国语学校地处市中心不远，濒临玄武湖依傍九华山，校园里绿树成荫、

环境幽美。学生一律住校，即使学生的家与学校仅一墙之隔也不例外。学校的办学目的是为国家培养高水准的外语人材打好基础。当时的南京外国语学校 and 南京师范学院<sup>[1]</sup>附属中学（简称南师附中）可以说是江苏南京地区地方权贵子弟云集的学校。

文革结束后，中国派出首批出国留学生，9 名学生中有 2 名来自该校。该校培养出众多的外交官和国家领导人的翻译，校友遍及全球。目前该校已经成为全国顶尖的中学之一。然而，在这些光环之下，该校的历史上有着最黑暗的一页。本书将掸去历史的尘埃，翻开该校历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一页。

1966 年 8 月起，在北京“红八月”红色恐怖的影响下，南京的红卫兵也掀起了暴力潮。南京外国语学校的一派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思想兵”）<sup>[2]</sup>无故打死了南京市玄武区建筑联社第三工程队的工人王金先生。

## 1.1 王金事件真相的不同版本

王金事件真相有三种广为流传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红卫兵贴大字报挡住了王金家的门，使王金进出不便，王金与红卫兵发生了争执，所以被红卫兵打死了。这一说法从一些网页上可以看到。第二种说法影响比较大，出自于王友琴博士写的《文革受难者》<sup>[3]</sup>一书。书上是这样描写事实经过的：

王金，南京市的一个普通工人，1966 年 8 月中在公共汽车上被南京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抓走打死，红卫兵说王金“家庭出身不好”，该打。

很多南京人都知道“王金”，知道他是个工人，“家庭出身不好”，被高干子弟红卫兵打死了。1966 年时这是很轰动的事件。

南京外国语学校当时的一名学生说，1966 年夏天，他们学校的红卫兵打了不少老师。教初三的一个普通女老师，因为信宗教，不但被剃了“阴阳头”，还被打得很厉害。8 月中旬，外语学校红卫兵在公共汽车上抓了工人王金，把他打死。红卫兵说王金“家庭出身不好”，当时他们打了很多“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称之为“狗崽子”。但是王金的同事们说他是“工人阶级”。很多工人为王金之死包围了外国语学校。全南京的人都知道了一件事情。中共南京市委和公安局为此逮捕了三个红卫兵头头，其中一个在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的儿子，来平息工人的愤怒。另一方面，中共南京市委和公安局把

---

<sup>[1]</sup> 现改名为南京师范大学。

<sup>[2]</sup> 另一派红卫兵叫做“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当时，南京外国语学校改名叫做“南京国际共产主义战校”。两派的红卫兵均由出身红五类的学生组成。

<sup>[3]</sup>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实录》（电子版），2004 年，第 596 页。  
<http://www.chinese-memorial.org/>



外语学院<sup>[1]</sup>的学生护送出校，到农村住了几天后，送他们去“革命大串连”。

这名学生到北京后，8月31日在天安门广场见到了毛泽东。那是毛泽东在8月18日以后第二次接见百万红卫兵。这名学生说，在北京，他看到北京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比南京外国语学校更加暴力。

根据笔者向南京外国语学校多位知情者的了解，校友中流传着另一种说法。红色恐怖激起了民众私下的不满和反抗。当时传说有两个叫做“国际打狗队”和“蓝衫队”的组织与红卫兵作对。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几位女“思想兵”在地处闹市区的新街口散发传单，市民们哄抢传单，有人趁机欺负这些女生。她们回校以后向男生们哭诉了受辱经过。“思想兵”的男生们被激怒了，决定再一次让女生们出去散发传单，由男生们在后面跟踪保护。

9月27日，几位女“思想兵”在新街口开完大会后又开始散发传单。跟在后面的男生们发现了两个行迹可疑的人，其中一人叫王金。散发传单的“思想兵”发现王金捡了一张传单还不满足，跟着红卫兵又捡了两张。王金被怀疑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梳着西式发型并且穿了一双擦得雪亮的皮鞋，被“思想兵”认为不是流氓就是阿飞，反正不是好人。“思想兵”们把他抓了起来押向学校。在回学校的路上，他们遇到了王金单位的指导员，在单位领导的担保下，“思想兵”暂时放了王金。

“思想兵”在当天还抓了一个人，此人自称姓叶。红卫兵把他抓来后关在楼梯间里。那天晚上，负责看守的“思想兵”大意睡着了。自称姓叶的人翻墙逃跑了。估计他讲的是假情况，第二天“思想兵”找不到那个人。“思想兵”怀疑王金与他是一伙的，就去玄武区建筑联社把王金抓来了。倒霉的王金成了他们的出气筒。

王金解放前曾是国民党军的中尉司药官。在淮海战役中，王金被中共军队俘虏，释放后回到南京。此后王金曾在徐州市的一家医院任药剂师。因为一起医疗事故造成一名工人死亡，王金被判了刑。刑满释放后，王金回到南京，做过工人和小商贩，最后进入玄武区建筑联社第三工程队当灰沙工。

王金与妻子的关系不是太好，所以下了班以后常常在街上遛达。那一天，他看到有人撒传单，就跟在红卫兵后面多捡了两张。在审讯中，王金说不认识前一天晚上逃跑的那个人，“思想兵”们认为王金不老实。当“思想兵”问王金是否有历史问题时，王金老老实实在地交待了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军的经历。

“思想兵”们的父母大多是出生入死打下江山的共产党人。对于红卫兵来说，国民党是共产党不共戴天的敌人，眼前的王金曾经参加过国民党军队，这还了得。

---

<sup>[1]</sup> 应为外语学校。

“思想兵”们出了一道算术题，问他在战场上救治了多少国民党兵，被他救治的国民党兵又杀害了多少解放军。王金回答不了，挨了打。一位有同情心的高中同学<sup>[1]</sup>试图阻止殴打王金的暴行，但是没有能够成功。

很快，王金被打得皮开肉绽、头破血流，殷红的鲜血溅到了雪白的墙壁上。

“哇”的一声，传来了一位女生的哭声。一名女生被惨无人道的场面吓哭了，掩面逃出了审讯室。事后，她还为此写了检讨书，承认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不坚定，对阶级敌人存有同情心。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人们已经不知道何是何非了<sup>[2]</sup>。

王金被放回楼梯间里无人过问。王金醒来以后饥饿难忍，向红卫兵要吃的。红卫兵的管理混乱，没有专门看管抓来的所谓“犯人”的人员和机构。红卫兵的吃饭问题是自己负责的，他们自行到食堂买饭，谁也不会自掏饭票为王金买吃的。有一位“思想兵”给王金喂了一勺子贴大字报的浆糊。

第二天(即9月29日)上午7时许，一位小学五年级英语班的同学到学校去玩，看到王金躺在楼梯间的地上奄奄一息。王金当时还能说话，向这位同学要水喝。他对王金说，“地上不是有水吗？”离王金不远处的地上放着一只碗，里面盛着水。王金答道，“那是生水，不能喝。”曾经是药剂师的王金此时脑子还是清醒的，还能知道没有烧开的自来水不能喝，喝了会生病。

大约10点多钟，人们看到学校的护士急匆匆地向关押王金的大楼跑去。护士给王金打了强心针，但未能救活王金。王金的死不仅是被打受伤所致，而且是严重的饥饿和缺水引起的。“思想兵”关闭了学校的大门，不许任何人进出。人的生命是多么脆弱，两天前的王金还在生龙活虎地抢传单，今天的王金却在红卫兵的拳打脚踢之下生命戛然而止。

下午2、3点钟，×××(第1号凶手)回到学校。当他听完汇报以后，对大家说，“此事到此为止，不要说。”下午很晚时刻，校门才打开，人们可以离开学校。虽然死了人，红卫兵们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叫人把王金的尸体拉到火葬场去火化，以为完事了。

## 1.2 王金事件的责任人

王金事件发生时，南京外国语学校“思想兵”的许多骨干成员都外出到北京等地串联去了，留下初三法语班的×××(第1号凶手)和初三英语班的×××(第2号凶手)作为“思想兵”的临时负责人，领导低年级的红卫兵成员。第1号凶手是“思想兵”的第一临时负责人。第2号凶手是第二临时负责人，兼任排

<sup>[1]</sup> 据笔者所知，他是高三德语班杨姓男生，平民子弟。该同学正直敢言，后成为检察官。

<sup>[2]</sup> 这是笔者当年听同学说的，但是经过50年后，笔者无法找到其他人证实此事，大家都说不记得了。

长，专管初一年级的“思想兵”成员。初一年级有三个班，分别是初一英语班、初一德语班和初一法语班，三个班中的“思想兵”成员被分别编为三个红卫兵班，受第2号凶手的直接领导。

关于打人的责任问题，南京外国语学校的校友中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第1号凶手打了第一下，第2号凶手打了最后一下，第3号凶手和第4号凶手（女）打得最凶。第二种说法是，第1号和第2号凶手根本没有参与打人，是其他20多名“思想兵”和外地红卫兵共同打的，其中第3号和第4号凶手（女）打得最凶。一位曾是“思想兵”的知情同学（当时的小负责人，“思想兵”的班长）曾再三对笔者说，第1号和第2号凶手绝对没有参与打人。他还特地强调，王金死时第1号凶手根本不在学校里，在校外执行任务。抓第1号和第2号凶手是因为他们俩讲义气，对王金事件大包大揽，主动承担了责任。

### 1.3 工人、学生联合调查团的成立

王金的死讯迅速地传开了。首先站起来的是王金生前的同事们。虽然市民们对共产党权贵早有怨气，但是平时一直不敢造次。王金被殴致死引发的怒火犹如火山一样猛地迸发出来，一发不可收拾。事情竟然这么凑巧，王金作为建筑工人曾经为建造南京外国语学校的教学大楼和宿舍大楼辛勤劳动过。他被折磨致死的地方正是他曾经挥汗如雨辛勤劳动之处。人们被激怒了。

10月2日，玄武区建筑联社第三工程队的工人们首先贴出了“强烈抗议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学生打死工人一事”的大字报。全城为之震动，要求严惩凶手的大字报立即铺天盖地布满了主要街头和广场。10月3日，王金的3位同事与华东水利学院<sup>[1]</sup>的7位学生成立了调查小组到南京外国语学校进行调查。14日，王金生前的同事、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和“全国革命造反串联总队”发起，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打死王金事件进行深入调查。16日，一个群众性的草根组织“9·28王金事件联合调查团”（以下简称“9·28调查团”）在南京大学正式成立。该调查团由南京市玄武区建筑联社、南京长江机器制造厂、南京电子管厂和南京大学等40多个单位的工人和学生组成，其主要成员有王金生前的同事查全华等人。查全华和南京市玄武区建筑联社的同事袁金龙、陈苗生、储贵银、戴敏、陈春景和杨正喜等是积极的发起者和参与者。

研究中国文革的大多数文献把有名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作为中国第一个工人造反组织。但是南京“9·28调查团”在两个意义上超过了上海“工总司”。首先在时间上，南京“9·28调查团”于10月16日就已

---

<sup>[1]</sup> 现更名为河海大学。

经成立，而上海“工总司”是在1966年11月9日才正式成立。南京“9·28调查团”比上海“工总司”整整早了24天！其次在自发性上，上海“工总司”的成立是在北京红卫兵的帮助和参与下成立的。而南京“9·28调查团”完全是由工人首先发起，在学生的参与下成立的。南京“9·28调查团”成员中的工人们后来成为“江苏省工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江苏工总”）的成员，为文革中的江苏工人运动立下了汗马功劳。

“9·28调查团”派人四处请愿告状，有的到南京市委，有的到江苏省委，有的到上海华东局，有的到北京直接找到国务院和中央文革，有的人则在本市和周围城市大造舆论，连离南京约有130公里的安徽省芜湖市内都贴满了关于王金事件的大字报。更多的人则致力于在南京组织集会，抗议红卫兵的暴行。工人和群众在鼓楼广场集会，扬言要“踏平南京外国语学校”。工人们起初在外国语学校校门口抗议，以后冲破校门涌进学校并占领了礼堂，自发地召开了声势浩大的集会，要求惩办凶手。工人们站在外国语学校的教学大楼下，扬言要拆掉大楼为王金报仇。我的一位同学因不知情回答说是“思想兵”的，差点挨上愤怒工人的拳头。

为了防止工人和群众打伤学生，南京市市长岳维藩亲自出马，在学校的配电房里指挥警察保护学校和学生。市政府很快决定把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学生转移到外地。10月8日晚，副市长王昭铨亲自坐镇指挥，派出10多辆专门接待外宾的大轿车，开到了学校的后门，把南京外国语学校的部分学生秘密护送到与安徽交界的僻远乡间小丹阳公社。同时去的还有10多名市委工作人员，负责照看学生。他们不仅更改校名对不知情的农民进行隐瞒，连学生家长也不让知道学生的去向。

学生在那儿住了几天。由于走漏了风声，工人和群众准备追到小丹阳。学生们不得不分散地回到南京，并约好某日在鼓楼公园悄悄取外出串联的介绍信和火车票。据有的同学回忆，当时的联络方式有点像地下党的接头。学生们被告知，公园东面的一张石凳子那里有人接应。此人会拿着《红旗》杂志，面朝东坐着。只要告诉他是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就能得到介绍信和火车票。就这样，南京外国语学校的许多学生悄悄地离开了南京，逃到了北京和上海等地。

## 1.7 王金事件调查报告：王金是怎么死的？

9月27日晚饭后，王金在新街口广场，遇到南京外国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宣传队，抢了他们所散发的三张传单。这个举动立即引起了宣传队里作跟踪侦察工作的第8号凶手的注意。他觉得这个穿着普通工作服的人形迹可疑，

于是跟踪到估衣廊，喊了两部三轮车，招呼后面几个同学一起强行把王金架走。路经人民大会堂时，他们巧遇王金所在单位的指导员胡云钦，胡证实了王金是工人，并且作了担保，王金才被留下来。不过其中一个学生临走留下一条命令说：“今夜不准他回家，明天来要人。”于是王金留在三队<sup>[1]</sup>过了他一生最后的一夜。

第二天，9月28日中午11时，南京外国语学校学生第2号、第16号、第22号凶手、×××四人，拿着介绍信把王金带回学校，关进小教楼<sup>[2]</sup>楼梯间。从这以后，王金就失去了一切自由。

下午，在教学大楼俱乐部里，由第2号凶手和×××对王金进行了审讯。王金毫无隐瞒地把自己在历史上曾参加过预备国民党员，是中尉药剂师，二阶佐理员，以及解放后配错药方，受到批评和后来在三队工作等情况作了详细的叙述。“审问”完毕以后，王金又被关进原处。

第二次“审问”是在4时左右，参加的人也较多，主要是重复第一次“审问”的内容，根本没有提到“国际打狗队”和“蓝衫队”等情况。这有当时的两次“审问”记录可以作证。但是，旧省、市委为了替凶手开脱罪责，不惜造谣说，凶手在“审问”中认为王金同“国际打狗队”和“蓝衫队”有联系，出于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才把王金打死的。在这一次审问中，第19号凶手用鞭子抽了王金脚，但受到第15号凶手的劝阻，原因是“等问清楚再狠狠地打他一顿”。

5时，市委驻南京外国语学校的联络员孙桂生和一些教师从大华电影院听完报告回到学校，听校长陈凤肖<sup>[3]</sup>说学生抓来了一个人。6时左右，他就汇报了市委教育小组秘书组朱兴祥。可是严重的事态没有引起市委老爷们的重视，以后第10号凶手又抓来了红五星木器厂的青工叶家复，关押在教学大楼的楼梯间里。

晚上，第1号凶手从外面抄家回来。这个年青的“负责人”在听了汇报以后，立即决定亲自“审问”，他们把已一天没吃东西的王金从楼梯间里拖了出来。问了几句以后，第×号凶手就不耐烦地夺了第×号凶手拿在手里的铁条，猛抽了王金两下，接着第×号、第4号、第20号、第5号凶手等便一拥而上，毒打了一顿，最后又关了起来，接着又把叶家复带到接待室里，进行了威逼审讯和拳打足踢，打得死去活来。

晚10时左右，王金又被拉出来，拖到厕所里。第×号凶手首先对王金的太阳穴猛击两拳。接着第7号凶手用木棍狠捣王金的腹部四、五下，打断了三根体操棒，而第6号凶手的体操棒毒打王金时断为三截。第15号凶手更狠毒地把皮带蘸水狠抽王金，王金的哀号并没有引起他们的任何同情，他们只是用力地打！打！王金有五、六次昏厥了过去，他们用冷水泼醒过来，还是打，直打得王金皮

<sup>[1]</sup> 即玄武区建筑联社第三工程队。

<sup>[2]</sup> 即小学部教学楼。

<sup>[3]</sup> 原文为陈凤肖。

开肉绽，鲜红的血流在地上，喷溅在天花板上，墙壁上。这次拷打直延续到午夜12时才结束。王金最后被关回楼梯间时，已是奄奄一息了。

29日上午8时，第×号凶手、第7号凶手、第10号凶手、第5号凶手、第6号凶手等叫王金出来，王金已经瘫在血泊中爬不起来了，这几个小家伙又打了一阵。10时左右，第16号凶手才想到要给王金吃点东西，可是王金四肢僵硬，瞳孔无光，已经死了。

校医赶来打针急救无效。于是第1号凶手、×××、第17号凶手三人开了介绍信，把王金用救护车送到了火葬场。他们既不通知死者家属，也不告诉死者单位，妄图毁尸灭迹。由于火葬场坚持一定要明确死者死的原因，第1号凶手才无奈通知了公安局，作了法医鉴定，并作了刑事摄影。与此同时，公安局一个便衣警察也到达了南京外国语学校，他们和这些小凶手握手言欢。并且看了他（她）们打人行凶的器械，传授他（她）们多长的鞭子打人最合手，还夸奖第15号凶手的鞭子编得好。这次所谓的“了解情况”实际上正是对罪犯的纵容和宽恕，叫我们想到北京西城公安局和西城纠察队的关系。

一个工人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我们要愤怒地斥问，王金的死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吗？不，绝对不是！因为在这以前，外语学校早已连续发生过几次抓人、打人事件，但是这并没有引起旧省市委的重视和注意，以致最后酿成了王金的惨死。

王金事件绝不是不能避免的。就在王金和叶家复被残酷拷打的当晚，511厂有一个工人已将情况告诉了近在外语学校咫尺的市委联络站，李秋阳转告了市委书记高黎光。可是，高黎光好梦方酣，醒来后才不耐烦地吩咐红卫兵总部去处理（即西城纠察队式的南京红卫兵警备纠察队）。此外，驻外语学校的市委联络员、校长陈凤肖、华业荫<sup>[1]</sup>，明知有人被打却一声不吭，听之任之。在这帮老爷的眼中，一个工人的生命究竟值几个钱？

## 1.11 调查报告与南京外国语学校校友传闻之间的差异

在调查报告中，王金事件的起因与前面提到的第三种说法比较接近。但是存在着诸多的微妙差异。首先，调查报告中特别提到了“国际打狗队”和“蓝衫队”的问题，明确指出这是省、市委为了替打人凶手开脱罪责造谣惑众制造的谎言。社会上是否存在过这些组织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在大量的回忆文革的文章中，没有人提到过这两个组织，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还很少有人敢与红卫兵公开作对。指控这是谎言的说法有一定的根据。

---

<sup>[1]</sup> 原文为华月荫。

第二，王金被抓时的穿着也有不同的版本。调查报告中描述王金是“穿着普通工作服的人”。这一说法是有针对性的，据传当时南京外国语学校红卫兵抓王金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头梳西装头，脚穿一双皮鞋。调查报告中特意强调王金穿着普通的工作服，以示王金是一名穿衣普通的工人。

第三，王金事件中的另一位受害人叶家复的情况与第三种说法也有差异。调查报告中没有提到叶家复的逃跑。根据调查报告，他的被抓与王金之死毫无关系，完全是另一桩独立的抓人和打人事件。而对于南京外国语学校了解王金事件的校友来说，叶的逃跑一事几乎人人皆知。笔者在当年就听说过。因为叶的逃跑，“思想兵”恼羞成怒，又把王金抓来审问，审出王金的历史问题，结果导致王金被打。这一情况逻辑上说得通。当然，这种说法并不能减轻凶手的罪责。

第四，调查报告中王金的简历与南京外国语学校同学中所流传的说法也有两处明显的差别：王金在淮海战场上被中共军队俘虏一事和在徐州医院里因医疗事故坐牢一事没有出现在调查报告中。但是，调查报告中特别澄清了王金的历史问题。根据调查报告，王金的历史是清白的，只有一般的历史问题。关于王金历史上有问题的说法在南京外国语学校的校友中流传甚广，笔者在当时也早有耳闻。按照当时中国社会的标准，玄武区建筑联社是个阶级成份复杂的单位，里面有大量刑满释放的人员和有所谓的历史问题的人员。王金被中共军队俘虏和因医疗事故坐牢在该单位不算是稀罕事。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诸多的差异？这个问题对于 50 年后的今天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无论另一个受害者叶家复是否前一天夜里逃跑，无论王金当时留有何种发型，穿着何种鞋子，无论王金是否被中共军队俘虏过，无论王金因医疗事故被判刑与否，都不能减轻打人凶手的罪责。但是，这些差别在当时的中国却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

如果王金确实被中共的军队俘虏过，如果他确实被判过刑，那么他属于“地富反坏右”一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红卫兵殴打王金就有了“正当的”理由。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有案可查的达 1700 多人。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所谓的历史问题。那些红卫兵并没有受到任何的追究和法律制裁。套用同样的原则，南京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如果是“好人打坏人”，那么他们责任就要小得多。如果叶家复前一天夜里逃跑了，红卫兵第二天因为寻找出气筒打死了王金，罪责也许可以小一些。而且如果王金在被抓时真的穿着皮鞋留着分头，打扮时髦，那么在破四旧的文革期间，这一行为本身就应该受到打击，打王金自然成了正当的革命行为。

调查报告中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报告正文说：“驻外语学校的市委联络员、校长陈凤肖、华业荫，明知有人被打却一声不吭，听之任之”。但是在

另一处，国营×厂工人的大字报里却说，“市委的联络员与该校校长见他们打王金等人，也劝阻过，但他们不听，想打电话，电话被他们把住，想出校门去报告，校门口也把住不许出，这些都是不懂事的孩子能干得出来的吗？”从后者的说法可以看出，市委联络员和校长曾劝阻过并试图向上级报告未果。

调查报告公布时，省、市委已经瘫痪，大多数的领导人已经被打成走资派失权了。在对立面已经没有话语权的情况下，调查团的报告稍稍地偏向受害者是可以做到的。笔者并非试图否定调查报告中红卫兵打死王金的基本事实，而是对其中的某些细节加以考证，力图使读者能够更接近事实真相，从而更深刻地了解当时的中国社会。

两份法医鉴定书除了细节方面的差别外，有一处重要的差别值得一提。原始法医鉴定书中报案人是南京外国语学校的人事秘书徐漪波女士。而更改过的法医鉴定书中则称第1号凶手为报案人。这一改动明显地有袒护红卫兵的目的。红卫兵打死了人，主动报案，罪责可以减轻一些，至少从态度上说是自首。而如果红卫兵打死了人，是由其他人报的案，那么至少说明红卫兵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关于打人责任的问题，南京外国语学校中流传的两种说法与调查报告完全不同。根据调查报告，第1号和第2号凶手不仅要担负组织责任，他们俩同时也是打人凶手。坦率地说，如果笔者没有获得调查团的调查报告，一定会相信第1号和第2号凶手没有动手打人只是负有组织责任的说法。

尽管南京外国语学校校友中流传的说法与“9·28调查团”的调查报告之间有诸多的差异，但是对于红卫兵打死工人王金这一基本事实，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调查都是没有疑问的。当时官方也有一个“王金事件调查团”，由玄武区建筑联社的领导胡云钦和马贵臣组成。官方与民间的主要分歧点在于如何处理凶手。官方坚称红卫兵打死王金属于“好人打坏人”，“大方向正确”，所以凶手不必受到法律制裁。但是广大民众却坚持杀人偿命，凶手必须严惩。

## 1.12 缉拿凶手

1966年12月30日，市政府在民众的巨大压力下决定缉拿凶手。参与殴打的南京外国语学校的“思想兵”共有31人，只有1名是高一的学生，其他人都是初中的学生，其中初三的有9人，初二的有13人，初一的有8人。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最大的有18岁，大多是15、16岁的孩子。凶手中有6名女生。这些学生中只有2人是工人子弟，4位学生未注明家庭出身<sup>[1]</sup>，其余的25人

---

<sup>[1]</sup> 据笔者所知，他们也是干部子弟或军队干部子弟。



都是干部子弟或军队干部子弟。

南京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打死王金与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打死她们的副校长卞仲耘的情况非常相似。红卫兵是你一拳我一脚打的，至今说不清楚到底谁是主要凶手。当时在场的人应该个个有责任，他们都是凶手。

与北京红卫兵打死人不同的是，王金事件刚刚发生，王金生前的同事们就站出来为王金鸣不平。他们的抗议引发了南京民众的强烈反弹，联合调查团穷追不舍，迫使当局协助调查，在数月内把真相公布于众，使得打人细节没有被遗忘。

“9·28 调查团”对历史做出的贡献不仅仅是弄清了打死王金的真相，更重要的是对南京市乃至江苏省红卫兵的暴力行为起到了阻遏作用。王金事件以后，南京红卫兵无故打死人的现象得到了扼制，许多无辜的百姓逃脱了厄运，保留“9·28 调查团”调查报告的南京外国语学校吴玉璋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受益者。她当时被批斗得很厉害。她赴北京告状，被南外在京的红卫兵发现抓了回来，打得更惨。吴老师生前总是说，“王金是我的替死鬼”。

市委决定逮捕三个人：×××（第 1 号凶手）、×××（第 2 号凶手）和×××（第 3 号凶手）。第 4 号凶手虽然是打得最厉害的凶手之一，但是可能因为她是女生而且年龄尚小，得以逃脱惩罚。第 1 号凶手的父亲是南京军区后勤部的少将副部长，是位 1929 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在逮捕凶手的大会上，第 1 号凶手的父亲公开表了态。他表示：儿子犯了法，应该受到惩罚，作为父亲支持有关部门的决定，决不包庇纵容自己的孩子。他的诚恳态度对于平息民众的愤怒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第 1 号凶手的父亲在其单位口碑相当不错，是位受人尊敬的将军和长者。

平心而论，第 1 号和第 2 号凶手为人挺好，在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师生中口碑甚佳。尤其是第 1 号凶手，虽然其父位居高官，他从不盛气凌人，平时尊重老师，与同学相处和睦，学习也很好，在同学中颇有威信。第 1 号凶手被捕后，他的老师不顾自己还在受审查的处境，不止一次地呼吁要求释放第 1 号凶手。

### 1.14 凶手们后来的命运

第 1 号、第 2 号和第 3 号凶手被拘留了近 2 年，于 1968 年 10 月工宣队进校后，由工宣队把他们从监狱里领回学校。他们三人下了乡，成为下乡知识青年。后来第 1 号凶手通过父亲的关系参了军，在南京军区的装甲兵部队服役。由于监狱里的恶劣生活和严重的精神打击，第 1 号凶手得了忧郁症。他变得沉默寡言，行动迟缓，无法适应部队的紧张生活。他后来进入大学学医，毕业后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检验科任技师直至退休。第 2 号凶手后来去了江苏的镇江，退休以后在南

京开了一家餐馆，成为一位商人。

与第1号和第2号凶手不同，第3号凶手在“思想兵”中并非重要骨干。他的个子不高，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从外表上看，绝对寻觅不到一丝的杀气。他参与了最后一次打王金，打得比较厉害，因此也被列为惩办对象。第3号凶手被释放后也参了军，成了一名工兵。他酷爱唱歌，在服役期间参加了当时流行的样板戏的演出。为了增强舞台效果，他参与了舞台爆炸火药的制作。不幸的是，火药发生意外爆炸。他的双眼被炸瞎，双手只剩下三根指头，成了特等残废军人，住进了荣誉军人院。第3号凶手的养父母相继去世，亲生父母下落不明，他没有其他兄弟姐妹。

参与打死王金的其他人多数参了军，退出现役后均获得稳定的工作，有不少人仕途发展顺利，他们中有的成了大学里的教授（包括欧美大学）或专业人士，有的成了国家机关、企业或事业单位的干部，也有的下海经商，成为阔绰的商人。

### 1.15 调查团工人成员后来的命运

相对于打人凶手，“9·28调查团”的成员却远没有那么幸运。最悲惨的是查全华。查全华曾是南京24中的学生。其才艺、特有的气质与亲和力使他在同学中成为佼佼者，初二时被推选为校学生会主席。查全华敏而好学，课余时间埋头读书。查全华喜欢写作，曾以“悲秋”笔名写些文章。当年正值中苏论战，报刊连续登载“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引起查全华的兴趣。在他的带动下，同学们积极投入学习讨论，各抒己见。他们的讨论超出了中苏论战范围，涉及国情、国策等诸多问题，其中不乏非主流的见解。1963年初，查全华和他的同学成立了一个学生社团——“癸卯宁条约”，并决定出一份不定期的刊物。

不料一位同学不慎将第一期“期刊”遗失。因上面写有涉及时政且不合时宜的内容，使得各位成员深惧影响自己的前途，一致决定停止活动。所幸的是，学校并没有任何动静。估计遗失的“期刊”可能被当成废纸扫入了垃圾箱。

毕业时查全华报考第四军医大学护士班，因家庭成份有问题，查全华政审不合格未能遂愿。他弃考高中，转由学校报名参军入伍。新兵集训结束时，查全华的出众表现与才华被连队领导相中，成为连队文书。

谁知祸从天降，当时在南京铁路运输学校就读的一位同学去信给查全华，告知他正在争取入团，想把初中时“癸卯宁条约”一事向组织做思想汇报，为此征询查全华的意见。此信被部队截获，直接导致查全华提前退伍，而且退役证上注明“不服预备役”。实际上，这是宣告了查全华政治生命的结束，他已经沦为一名“内控人员”。

退役后查全华被安置于南京玄武区建筑联社修建三队。此时的查全华在政治上已无所求。好学的他喜好上哲学，开始研读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列宁等人的著作。闲时偶与志趣相投的中学同窗相聚讨论。

1966年，文革开始。查全华的同事王金被南京外国语学校红卫兵打死。查全华义愤填膺，为死者伸冤，发起成立了“9·28调查团”，两次赴南京娃娃桥看守所提审已被收押的第1号凶手。后来，文革的发展使查全华冷静了许多。他辞去了工人组织中的职务，不参加当时的派系争斗，游离于文革之外。他潜心钻研马、恩、列、毛的著作，试图从理论上剖析这场运动。

1968年12月8日查全华的朋友柯德远即将插队盱眙农村，另一位同学也将从南京林业学校分配至东北。为替他们送行，查全华及另外两位同学与柯德远到林业学校的同学处聚会。这天他们成立了“马列主义小组”。按照查全华的想法，当时并没有成立一个政党的必要，建党时机尚未成熟。“马列主义小组”是为迎接可能发生的革命做些思想准备，称为小组更适宜些。今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再决定后面的行动。

查全华是当然的组长。查全华喜欢写作，以母姓起笔名“罗左”，显示了他做一个左派的志向。被当局定为反革命政治纲领的“论二次革命”是这段时间写的一篇文章。当时只有两人看过。其中一人是柯德远，他担心留下此文会遭祸，阅后即烧毁。该文并不是什么“政治纲领”，仅是查全华尝试运用马列的理论，剖析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及其给国家与人民带来的灾难，将平时大家讨论的东西作一个总结。该文对当时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持彻底否定的立场。

“二次革命”的提法是查全华预测将会发生的事情。他的依据是，造神运动出现的“早请示晚汇报”、搭“忠字台”、全民大跳“忠字舞”、“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等愚民政策物极必反。最终民众是会被愚弄的。众多的革命功臣被打倒，知识分子被冠以“资产阶级”，停课停产的革命，学生插队农村，民众稍不小心即因言获罪。凡此种种，导致的结果必然是走投无路的民众起来反抗。毛林自毁国家基石，随时可能引发革命，并很有可能爆发于党内当政者内部。

1969年初，“马列主义小组”中的王某再三向查全华提出，本厂青工朱某主动向其靠近，迫切希望加入“组织”，王某又拉上另一工人张某，认为成立南京玻璃厂马列主义小组条件已经成熟。王某力主成立南玻小组，要求查全华出席他们的成立现场，被查全华拒绝。后来应王某的请求，查全华写了一篇祝贺南玻小组成立的短文。查全华和柯德远当时的担心得到了证实，朱某实际上是官方的卧底。

查全华写的“论二次革命”的文章被当局定为反革命政治纲领。1969年12月15日，查全华被当时掌权的南京市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军管会的第

一把手是吴大胜，是第1号凶手的父亲的部下，来自南京军区后勤部。其中的奥秘和联系留给读者自己去体会。柯德远作为同案犯也被判刑。与查全华素不相识却为之鸣不平的下乡知识青年陈卓然不久后也被处决，陈的同案犯苏小彬被判处15年徒刑<sup>[1]</sup>。

1979年8月柯德远出狱后去探望查全华家人，才得知查母罗夫人不堪失子之痛含怨九泉多年。查父贵良老先生抓住柯德远的手，流泪不已，探问他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不明白他们引以为豪的优秀儿子为什么被杀。

查全华的二哥告诉柯德远，当年去要查全华骨灰时，还被迫接受支付子弹费等诸多刺心的羞辱后才获准3天后领取查全华的骨灰。查全华的二哥念念不忘火葬场极具正义感和同情心的那位师傅。在师傅的帮助下，查全华的二哥躲开监管的公安人员，潜入停尸房见到亲人的遗体。子弹从后脑贯穿头部，惨不忍睹。查二哥说当年一位刑警曾对他吼道：“你弟太顽固，什么都是‘没做过’、‘没写过’，什么都不承认，太反动太嚣张了。我们有证据，照样判他死刑！”查全华的父亲直到1979年底才收到对查全华“予以昭雪”的判决书<sup>[2]</sup>。虽然查全华和陈卓然的案件最终得到平反，但是人已经被冤杀不能死而复生。但愿查全华和陈卓然在天有灵能够知道，在近50年之后的今天仍有人记得他们，颂扬他们在文革中所做出的英勇壮举。

其他的“9·28调查团”主要成员在后来的清查5·16运动中均遭受厄运，成为反革命分子倍受迫害。有的人从此心灰意冷再也不介入群众运动。有的人仍不甘心，在后来的几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中有所表现，但是终不能成气候。由于企业改制，他们的生活受到影响，很多人在贫困中度日。目前，他们的大多数人已经谢世。少数几位在世的成员也不愿提起令人伤心的往事，谢绝采访。但愿后世的人们能够记住他们当年对历史做出的贡献。

文革中“9·28调查团”与当局的抗争是一次不对称的博弈，是一次先胜后败的博弈，是一次虽败犹荣的博弈。它将名垂史册。

---

## 【民间记忆】

# 留存痛史的塔园

## ——记中国首座民间文革博物馆

徐小青

---

<sup>[1]</sup> 任毅：《生死悲歌：〈知青之歌〉冤狱始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8页。

<sup>[2]</sup> 柯德远：《忆查全华君》，2011年，《地方文革史交流网》。<http://www.difangwenge.org/read.php?tid=6321>

当年文革狂潮遍及神州大地每一个角落，其血腥、恐怖、愚昧、荒谬……令未经历的后生代难以置信。文革结束后，文学大师巴金曾痛心疾呼建立文革博物馆，“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唯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

在巴金提议之后，国内最早创建的民间文革博物馆是广东汕头塔园文革博物馆。近年来，笔者曾多次去塔园文革博物馆，了解了该馆的方方面面，现介绍如下。（上图：塔园文革博物馆山门。）



## 建馆

塔园文革博物馆坐落在广东汕头市澄海区风景如画的塔山自然景区内，1996年开始创建，2005年对外开放。（下图：博物馆一景之塔山巨笔。）



塔山不高，山腰有一清澈的小湖，湖边有一座美丽的寺庙。当年，刚退休的汕头市副市长彭启安先生，偶然发现这里乱葬着许多本地文革遇难者，他感慨自己文革中也险遭毒手，于是萌发了在此建一个文革蒙难者纪念碑的想法，得到一批老同志的鼎力支持。后来，他们与当地村民达成共识，获准使用一些

山地，又得到社会各界包括海外侨胞的道义支持和经济资助。经数年努力，在山地上逐步建立起多处反思文革为题材的人文景观：纪念碑、天坛式展示厅、形象雕塑、文字碑墙、蒙难者姓名墙、警示钟、思安塔等等，规范为八大景区：宝塔思安、天坛博览、石镜明史、灵地永怀、碑廊鸣冤、巨笔解结、警钟长鸣、塔园迎春……整个构成塔园文革博物馆，简称塔园。

2001年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为建设中的塔园题词“要以史为鉴，千万不要让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

塔园文革博物馆的人文构建，均展现文革史实：如天坛式展厅的青砖环形壁上烧制了数百幅文革运动狂潮的图文；安息园广场的石屏围栏上刻画的文革中各种残害人的刑罚；巨大的黑色石墙上密密麻麻地镌刻着文革蒙难者的名字；还有

大量有关反思文革的石碑檄文……无不让人触目惊心！近年，塔园又新增彭德怀塑像，民间反文革女英烈王佩英、马正秀方碑等。观众在了解痛史的同时，自然引发对社会、人性的种种思考。

塔园开放十余年来，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纷纷辗转来到这个特殊的博物馆参观访问，国内外媒体均作过报道，社会各界人士及许多海外同胞也慕名专程前往。参观者留下了许多墨宝和意见、建议。

塔园文革博物馆为千百万无辜蒙难者勒石铭记，树碑立传，并多次组织民众为文革蒙难者举行公祭大会，呼唤人们不忘浩劫痛史、坚持人性良知。

## 公祭

文革中千百万同胞在生命的旺季死于非命：或被逼自杀，或死于武斗，或被



阴谋杀戮……无辜的灵魂冤气冲天！（左图：公祭大会一角。人群前边的塑像是刘少奇。）

塔园有石碑铭文：“文化大革命蒙难者，大都死得名不正言不顺，既非战死沙场，亦非因公殉职……死无名份的堂堂华夏子孙只能化作荡荡游魂，‘大庙不收，小庙不留’……复建安息园，使浩

劫蒙难者游魂能有一处安息之地。塔园将年年于八月八日举行吊祭活动，追念告慰蒙难者在天之灵，启迪生者牢记‘文化大革命’之殷殷史鉴。皇天后土，怀此国殇！”

塔园有公示：任何人均可以提供任何文革蒙难者的姓名及简况，塔园建设管理机构将常年不断收集，不定期地将蒙难者姓名刻上安息园的蒙难墙（免费）。如今蒙难墙上已刻有数千位文革蒙难者的姓名。

从 2006 年起，以彭启安先生为首的潮汕民间志愿者，每年 8 月 8 日组织民众到塔园为文革蒙难者举行公祭大会，外地也有人士专程前往参加。公祭活动连续进行了八届。为此，社会有识之士、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慷慨解囊，鼎力支持。

以下是 2012 年 8 月 8 日笔者第一次参加第七届公祭活动的纪实（下图：彭启安先生在公祭大会上讲话）：



公祭会场设在塔园主要景点——安息园小广场上，气氛隆重，布置俭朴，红底黄字的横幅标语上写着温家宝总理当年3月的讲话：“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公祭礼开始前，年届八旬的彭启安老人，特地安排我们姐妹在刻有先父名字的蒙难者姓名墙下献了鲜花，并与我们合影。

四百多位参会者主要来自潮汕地区，多是中老年人，也有肩扛手提影像器材的年轻人。在炎阳下，人们鱼贯而入。公祭大会先是放鞭炮、奏哀乐、向文革蒙难者献花、默哀。然后诵读祭文等，之后是来宾发言。

诵读祭文的老先生，身似铁塔，声若洪钟：

维 公元二零一二年八月八日，华夏民众、冤主亲朋，谨以花篮花圈献于文化大革命蒙冤罹难者灵前，而祭之曰——

历史悠悠，永无尽头。最悲惨莫如十年大动乱，最凄凉何若冤案似山丘。呜呼文革！发动失德。草木同哀，风云变色。忆起当时国情，官民战战兢兢。千倍于莫须有，万倍于焚书坑。君等蒙难，我辈伤情。公道自在人心，稗史记载分明。岁月如奔，世事回春。总理发警言，高层起强音。肃文革流毒，防悲剧重演；宏音传大地，塔园现曙光，七届成公祭，民众致衷心。逝者可流芳，以宝贵生命宏扬人间正义；安邦须鉴史，将和谐社会留与后代子孙。

安息吧，浩劫冤魄！安息吧，华夏英魂！

听着那极富特色、抑扬顿挫的潮汕语音，对照手中的祭文稿，脑海中浮现出少年时期所经历的荒诞恐怖岁月，百感交集……

来自河北六旬开外的S师傅发言，他忠厚的脸上写满沧桑，他说：“父母早年参加革命，却双双被打成右派，一家人妻离子散。文革初期，父亲为阻止红卫兵抄家烧书，竟被活活打死！……可怜我父未战死疆场，竟惨死在为之浴血奋战建立的新中国和平年月……父亲是高喊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被打死的……”

广西的C师傅性格开朗风趣，在控诉中也不失幽默：“1968年我20岁出头，因为写了一张要求停止杀害五类分子及子女的大字报，仅163字，就被判刑20

年，平均一个字就领受 45 天文字狱……直到 1979 年才被无罪释放，无一分钱赔偿……”

他们的发言令人们唏嘘不已。

我也作为受害者家属发了言，回忆父亲 1949 年随军南下，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却在文革中惨遭杀害，难忘父亲弥留之际，在肉体 and 灵魂的双重痛苦中发出“为什么……”的天问，我呼吁“人，要生有尊严死也有尊严！今天我们祭奠文革蒙难者，就是为了促使国家逐步走向一个全体国民真正有尊严的社会，即民主法治社会。千百万无辜蒙难者的鲜血岂能白流？！”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

发言来宾还有来自深圳某公司的 D 先生，他说：“虽然我本人和家人并未受到太多文革的冲击，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公民，不能置若罔闻……本人自创文革收藏馆，以‘收藏教训，警示世人’为目的，希望国家民族再不要发生文革的悲剧！”

一位未到场的老学者送来诗词，由人代诵：文革罪恶，无法掩盖。举世皆知，不如敞开。光明磊落，岂不快哉？……

最后是塔园文革博物馆创始人彭启安先生总结发言，他回顾了一年来塔园的风风雨雨，希望大家都能来支持和保护塔园。

## 前景

塔园创建以来，首倡者彭启安老人进行了各种努力，一心期盼能为塔园“正名”——成为有正式名份的博物馆，然而始终未能如愿，塔园至今仍然只是靠民间力量支撑的民间博物馆，政治、经济的压力不言而喻。

在号称大国崛起、经济腾飞的今日中国，中华民族还要不要保存对灾难历史的记忆？还该不该反思历史教训？塔园的命运又将如何？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以及关心塔园的朋友均在认真思考和关注。

2013 年 10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徐友渔先生在参观塔园时讲到：

海外有学者提出一个观点，即不提倡现今在中国建立文革博物馆，理由是“现在中国这样的政治话语条件下，建立任何博物馆，对历史的真实解释都是受限的，甚至会歪曲历史”。这是专家的研究信息，可以开阔思路。但我本人是不同意的，文革博物馆就是要建，关键是要坚持还原历史真相！……在政治形势倒退的情况下，塔园能保存下来就是最大的胜利！坚持下去、存活下去就是最大的奉献！



2014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授、著名宗教学专家何光沪先生参观塔园后，深有感触地说：

塔园保存历史，教育后人，避免悲剧再现，意义极为重大！更可贵的是对几千万冤魂的追思，我是从事宗教研究的，这种情感超越社会世俗，是永恒的。

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变化了，如苏联、东欧，还有台湾……都要追究历史问题，认清历史问题。南非政府主张要宽恕、赦免制造冤案的人，目的是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和谐。但这要有前提条件，就是必须还原历史真相！要想宽恕一个人，首先应知道这个人的真实情况，否则宽恕谁？赦免谁？所以国外有真相委员会，专门调查挖掘真相，把它铭记下来，这才会有公正，这是第一位的。加害人和受害人都要反思，吸取教训，以杜绝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除抗战、内战外，就是文革牵涉的受害者最多了。但最让人痛心的是，在中国没有把这个死了千万人、受迫害上亿人这样大的、前所未有的浩劫的真相完全调查记录下来，很多人不愿意去做，中国没有完成这件大事，这是民族的过失！

幸好还有从巴金、叶剑英，到彭老先生这样的干部，再到普通人，以及一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代，还有着这样的正义感受：一定要恢复历史真相并保存下去！但“还原文革真相，反思文革历史”这个沉重的负担，只依靠塔园的力量还是太小了，应发动社会大家的力量……

可喜的是，去年仍出现具有实力的国内及港澳朋友向塔园捐款，衷心希望这个中国民间文革博物馆能够生存下去。

中华民族的正义之光不会熄灭。天佑塔园！

---

## 【民间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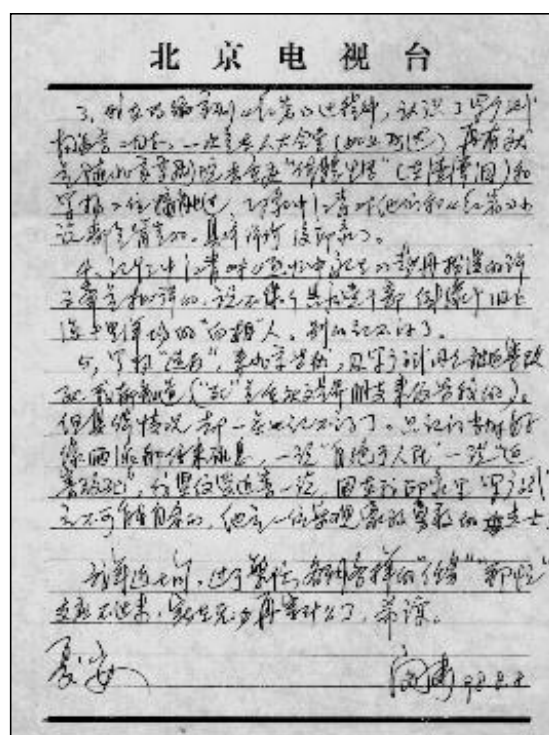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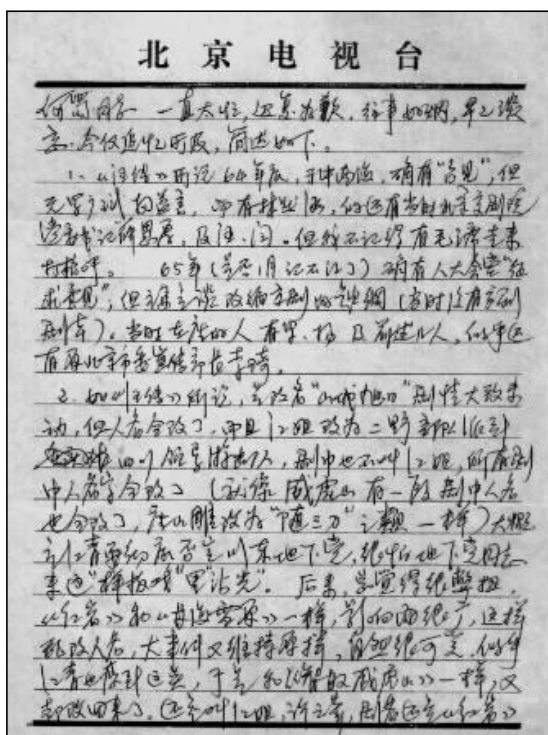
### 阎肃有关京剧《红岩》的一封信

何 蜀 提供并录入、注释

书信提供者说明：从报上惊悉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员、歌剧《江姐》编剧阎肃先生于2月12日在北京病逝。阎肃曾于文革前夕到文革初期奉江青之命参与改编京剧《红岩》，书信提供者曾于1998年就有关史实去信请教并建议他对此段历史写出回忆，阎老于百忙中回信作了认真解答，所谈及的一些史实十分珍贵。现将原信公布以资纪念并供研究者参考。为便于读者理解，略加注释。

何蜀同志：一直很忙，迟复为歉。往事如烟，早已淡忘。今仅追忆所及，简述如下：

1. 《汪传》<sup>1</sup>所说 64 年底，于中南海，确有“召见”，但无罗广斌、杨益言，而有林默涵，似还有当时北京京剧院党委书记薛恩厚，及汪、阎。但我不记得有毛主席走来打招呼<sup>2</sup>。65 年（是否 1 月记不得了）确有人大会堂“征求意见”<sup>3</sup>，但主要是谈改编京剧的提纲（当时没有京剧剧本），当时在座的人有罗、杨及前述几人，似乎还有原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琦【琪】。



2. 如《汪传》所说，是改名《山城旭日》，剧情大致未动，但人名全改了，而且江姐改为二野部队派到四川领导游击队，剧中也不叫江姐，所有剧中人名字全改了（就像《威虎山》有一段剧中人名也全改了，座山雕改为“随三刀”之类一样），大概是江青彻底否定川东地下党，很怕地下党同志来这“样板戏”里“沾光”。后来，总觉得很别扭，《红岩》和《林海雪原》一样，影响面很广，这样乱改人名，大事件又维持原样，自然很可笑。似乎江青也感到这点，于是，和《智取威虎山》一样，又都改回来了。还是叫江姐、许云峰，剧名还是《红岩》。

3. 我在改编京剧《红岩》过程中，认识了罗广斌和杨益言二同志，一次是

<sup>1</sup> 指陆建华著《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7 年 7 月第一版。

<sup>2</sup> 指《汪曾祺传》中写到江青在中南海召见汪、阎等人谈京剧《红岩》改编事，“那一晚的谈话是在中南海毛主席书房外面的一间房子里进行的。谈话中间，毛主席曾从书房里出来过一次，大家连忙站起来，但毛主席亲切地挥了挥手，说：‘你们谈，你们谈。’说完又退回书房中去了。”见《汪曾祺传》179 页。

<sup>3</sup> 指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有关人员征求对改编京剧《红岩》的意见。据杨益言回忆事前给了他和罗广斌两本京剧改编本。见杨益言著《红岩逸闻》，重庆出版社 1996 年版 147 页。

在人大大会堂(如上所述),再有就是随北京京剧院去重庆“体验生活”(在渣滓洞),和罗杨二位接触过。印象中,江青对他们和《红岩》小说都是肯定的。具体评价,没印象了。

4. 记忆中江青对《烈火中永生》赵丹扮演的许云峰是批评的,说不像个共产党员干部,倒像个旧上海十里洋场的“白相人”。别的记不得了。

5. 罗、杨“造反”,来北京告状<sup>1</sup>,及罗广斌同志被迫害致死,我都知道(“死”是重庆文艺界朋友来信告我的)。但具体情况却一点也记不得了。只记得当时好像两派都传来讯息,一说是“自绝于人民”,一说是“迫害致死”。我坚信受迫害一说,因在我印象里,罗广斌是不可能自杀的,他是一位乐观豪放勇敢的志士<sup>2</sup>。

我年近七旬,过于繁忙,各种各样的“任务”“帮忙”支应不过来,实在无力再写什么了。希谅。

夏安!

阎肃 98.8.8

(有关当年江青指示改编京剧《红岩》及这个戏几经折腾最后被宣布“弃稿不演”的曲折命运,可参看何蜀《“样板戏”〈红岩〉夭折记》,载2003年9月25日《南方周末》1024期;后选入《迟到的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一版。)

---

<sup>1</sup> 罗、杨到北京告状是分别进行的两次。一次是罗广斌于1966年12月重庆发生造反派与保守派大规模武斗的“一二·四”事件之后,罗广斌率造反派的“一二·四惨案赴京控告团”到北京告状,并于12月17日首都三司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全国在京造反派集会上当着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中央领导人的面作了控诉“反动的重庆市委”操纵保守派镇压群众的发言(发言时周恩来等领导人退到主席台后去了);另一次是1967年2月罗广斌自杀后,杨益言、刘德彬和罗广斌夫人胡蜀兴等到北京找中央文革告状,并与中国青年出版社小说《红岩》责任编辑张羽等一起在北京许多单位的群众集会上宣讲罗广斌的革命历史、控诉重庆的“走资派”谋害了罗广斌。

<sup>2</sup> 长篇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因1958年刘被以“严重右倾”罪名处分后,小说出版时市委决定刘不署名,“以免被动”)于1966年10月在重庆市文联率先造反后,成为重庆造反派中影响极大的风云人物,但因1967年1月夺权导致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后,罗等介入派性矛盾太深,遭到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和北航红旗驻渝联络站为首一派的尖锐抨击,称之为“埋藏在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山城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罗广斌于1967年2月5日被重庆地区军队院校红色造反联络站和北航红旗驻渝联络站、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等从文联家中抓走,关押于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八一楼三楼,被令交代历史问题。10日清早罗在关押地跳楼自杀。文革结束后经重新调查(罗广斌的生前友好、原地下党战友、文革中也在一起参加活动的曹开参加了这次调查),曹开和刘德彬、张羽等最终都认可了罗是自杀的结论。